Co-China 周刊

NO. 175
2014年10月17日

亚洲与民主之缘：

战争，殖民与回归



编者的话

香港的占领运动仍在继续，争取民主的努力没有停歇。最近，民主的内涵和追求民主的形式，成为热门的讨论话题，也是占领运动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议焦点之一。

回顾历史，现代民主在亚洲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虽然亚洲民主政体的数量在上升，但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利益纠葛，多数政体还需要质的提高。本期 Co-China 周刊从“战争”、“殖民”和“回归”三个维度，回顾现代民主在亚洲的成长。

战争和冷战都曾是亚洲国家建立民主的契机。二战结束伊始，日本与韩国就成为美国抵制社会主义扩散的前沿阵地。在美国占领军的引导下，废墟中的日本不但逐步进入复兴模式，同时也接受了政体的全面民主化。美国对日本的民主改造，不仅仅是对军国主义的惩罚和防范，还是一场中西方文明的遭遇战。韩国的“政改”就不那么顺利。虽然与日本同属资本主义阵营，但韩国没有从美国直接继承西方民主的衣钵。在经历了几轮独裁、政变、暗杀、抗议和流血之后，韩国的民主才逐步进入正轨。

与日韩相对的，是从殖民历史中走出的印度和缅甸。在英国的统治下，族群的跨境迁徙和区域的行政划分是常见的治理手段。然而，独立后的殖民地却面临着领土的争议和外来民族的安置问题。接受了传统西方文化熏陶的印度建国者移植了议会制度。多年来，除了与近邻巴基斯坦常年对峙，印度在国内大体避免了族群冲突可能引发的内战。

缅甸的政治发展则一路艰辛。独立后的缅甸政府迅速被军人控制，直到近年来才开始民主改革。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武装与中央政府打打停停，至今还没找到全国认可的联邦机制。罗兴亚人的遭遇便是缅甸现状的真实写照。他们随英国殖民者而来，信奉伊斯兰教，在佛国缅甸算是绝对的少数派。缅甸政府不承认罗兴亚人是缅甸公民，使其在缅甸享受不到任何权利。绝望中的罗兴亚人铤而走险，一部分逃到中国和孟加拉等国境内，另一部分则拿起了武器在缅甸国内反抗。如果缅甸的民主将少数民族排斥在外，那么其合法性与合理性该从何说起呢？

在亚洲政治众生相中，香港可谓独树一帜。虽然曾与印度等同为英属殖民地，但香港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绝非独立的存在。在韩国人走上街头抗议的年代，香港社会却大体平静。有一种说法认为，香港人看惯了革命给大陆带来的血雨腥风，所以对本地的稳定与繁荣颇为满足。回归后的香港进入了“一国两制”的状态，但港民却对政治参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毕竟，摆脱殖民统治便意味着自己当家作主，而“一国两制”偏偏就是要维持殖民状态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政治自主好似维持资本主义状态的配件，一旦与更高层的利益发生冲突，就可视喜好伸缩。不幸的是，香港人争取政治权利的形式越激烈，北京的神经便绷得越紧，直到“一国两制”失去原有的弹性。

目录



        

【舶来的民主】

郑永年：亚洲民主(化)的吊诡



郑永年，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

传统上，亚洲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体制，亚洲的近代民主体制不是本土的产物，而是从西方输入的。历史地看，亚洲民主政体的产生主要有几种途径。

”

传统上，亚洲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体制，亚洲的近代民主体制不是本土的产物，而是从西方输入的。历史地看，亚洲民主政体的产生主要有几种途径。

第一、殖民地的遗产。很多亚洲国家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在殖民地期间，亚洲没有一个地方成为民主国家，因为殖民地关心的仅仅是殖民者的利益。（香港的民主也只有在香港要回归中国之前，英国人才引入了英国人所界定的“民主”。）在殖民地结束后，殖民者留下了一些日后导致民主发生的政治因素，例如多党制、选举等有利于民主产生的因素。对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来说，这些不是本土的制度因素。

第二、西方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占领”。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占领期间，美国帮助日本发展出了日本形式的民主体制。当然，这里也不能忽视日本本土的一些有利因素。日本明治维新后，经过很多内部改革，已经开始发展出一些民主要素。但美国的“占领”的确使得日本在短时期内确立了民主。不过，这种通过他国“占领”而快速催生的民主，也给日本留下了无穷的问题。日本现在正在进行的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无疑是要修正美国“占领”之下所确立的宪政政治体制。

第三，在外压下的内部民主化。内部民主化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政治动力结合的产物。这里的民主化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统治阶层之所以要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主要是迫于外部地缘政治压力，通过民主化来继续求助西方和美国的支持。但同时，统治者

也面临内部的民主化压力。一般的情况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部中产阶级不断成长壮大，产生参与政治的压力。韩国和台湾是典型的例子。

第四，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化大多是一些政治理想主义组织的民主追求，香港正在发生的就属于这种类型。参与民主运动的群体很复杂，但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或者政治功利主义者（需要另文讨论）动员起来的对现状不满的各个社会群体。

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体制

无论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还是作为一种体现政治价值的制度安排，民主历来就是一种既具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的体制安排。在西方也是如此。说它具有生命力，是因为民主可能是最能体现政治本质的政治活动。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而民主政治是一种比较文明（就是说公开的政治斗争）的政治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为人们所追求。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表现为妥协的产物。民主尽管表现为斗争和冲突，但其主体是妥协。有斗争，但必须达到合作；否则，民主就无法运作。竞争和妥协是西方民主的本质性东西。

西方长期实行精英民主，为妥协提供了数量条件，因为精英数量的多少决定了民主竞争的可行性。当然，西方民主能够运作，不仅仅是因为民主的精英性，更是因为民主的有限性。西方提倡有限政府，体现在民主上，更是有限民主。民主是有限的，只限于那些政治人物的选举。民主不仅和官僚体制没有关系，和其他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领域也没有必然的关联。这些非政治领域是否民主化，不是国家政治问题。

同时，民主经常表现为非常脆弱。一旦精英之间无法达成妥协，民主很容易出现问题，甚至解体。这样的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妥协的政治文化是民主生存的前提条件。在妥协的条件下，民主是一场双赢游戏。

西方民主的这种妥协性，在大众民主到来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参与政治的社会群体剧增，使得民主的机制不堪重负（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过度民主参与”理论所关切的问题）。同时因为社会往往被整体动员起来，各政党都能得到相当规模的支持者，多党政治演变往往成为互相否定的“否决政治”。互相否决的出现，使得传统精英民主的“双赢游戏”演变成为今天的“零和游戏”。大众民主使得政府无法有效运作，什么也做不了，最后谁都会成为牺牲品。西方民主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亚洲的情况更为糟糕。亚洲并没有类似西方那样的“妥协文化”。亚洲盛行的历来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不妥协文化”。传统上，革命很简单，只是意味着政权更替。这种文化在现代社会是否已经转型？经验地看，没有。结果，在没有妥协文化的情况下，民主出现“吊诡”，民主的结果往往是“反民主”。

“反民主”的两个面向

“反民主”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方式来追求民主；另一方面是追求民主的结果，使得民主本身所包括的价值流失。

就追求民主的方式来说，政治斗争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民主本来就是一种斗争形式。但如果只有斗争，没有妥协，民主就会体现为“反民主”，也就是持续的斗争。在亚洲，民主往往处于不间断的全天候的政治动员过程中，并且政治动员往往求助于阶级、种族、民族、宗教等一切可能的因素。即使社会不存在这些因素，政治人物和激进知识分子也会把这些因素创造出来。这样，民主化的过程演变成为泛政治动员。更危险的是，这种过度的政治动员往往把对抗“外敌”的方式（例如民族主义），用于对付其他社会群体（例如台湾的“本省人”和“外省人”、香港的“香港人”和“大陆人”的认同政治）。当然，在民主产生之后，这种现象同样会继续存在下去，出现“泛民主现象”。社会往往被高度政治化，政治没有限度，民主没有限度，可以进入任何社会领域。

在社交媒体时代，过度的动员已经变得司空见惯。社交媒体拥有巨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起足够的政治支持者、参与者和同情者。这很容易造成不尊重少数人、甚至不尊重大多数人的局面。“唯我独尊”是社交媒体的主要特征。社交媒体本应让人们更具包容性，因为人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但实际上刚好相反。社交媒体使得人们只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而不会去理会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这样，对民主追求者来说，民主不是众多利益和价值的妥协，而是“我的价值的实现”。在这个过程，很容易把自己的价值无限道德化，而把别人的价值妖魔化，造成了一种“乌托邦主义”的局面。当然，民主的反对方也趋向于这么做。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双方的公开冲突，甚至暴力。历史上，民主已经制造了无数的可歌可泣的英雄甚至烈士。这种情况今天仍然在继续，社会媒体以其特有的速度和方式塑造着民主英雄。

如果民主是通过“反民主”的方式争取而来，所产生的民主体制也必然包含“反民主”的因素。为了反对而反对，已经成为亚洲民主的最主要特点。例如，亚洲民主制度设计的一



大特点，就是无限度地限制掌权者的权力。这本身没有错，因为无限的权力会导致权力的滥用。亚洲的问题在于度。不难发现，亚洲民主往往体现为没有人负责的政治治理结构。

民主走向了反民主也表现在民主化之后，原来所追求的民主价值的消失。如前面所说，在亚洲，民主的过程往往也是把其他一切领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民主化”的过程，造成了泛政治化。在一些地方，民主成为社会沉沦的根源，而非向上进步的动力。一些地方，民主的确是“典范”，但除了民主之外，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被虚无化。

反民主在经济上表现得最为显然。对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无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讨一个生活”是最为重要的。在民主化来临的时候，很多人会成为支持者、参与者或者同情者，他们相信民主能够为他们带来这样那样的经济好处。但结果往往不是这样的。如果民主造成了经济上的不进步，甚至恶化。人们最后必然对民主失望。

在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在很长时间里，民主和资本主义同时进步。一方面，民主通过各种方式帮助资本主义的进步，例如法治的实施、社会的稳定、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社会政策的确立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也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和维持庞大的中产阶级，帮助民主的可持续发展。西方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为后来的福利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并非资本本身发展的产物，而是包括民主化在内的政治改革的结果——民主使得资本主义“变好”。

但在亚洲，民主搞得不好，就走向了反面。民主造成了社会的过度政治化，商业投资环境的恶化。很多附加值高的资本流出本土，去寻找投资环境较好的地方。民主一方面大大提高了资本的成本，另一方面并没有为资本提供更好的政治环境。因此，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往往走向廉价资本主义，也就是产业往附加值低的方向发展。

资本历来不想被政治控制。在全球化状态下，政治也控制不了资本。一旦民主化影响了资本的运作，高质量的资本便会寻找海外市场，而低质量的资本无处可去，只能在内部发展。如果说在西方，民主提升了资本主义，造就了好的资本主义；在亚洲，民主在导致资本主义的沉沦，向“坏”的方向发展。最近台湾频发的食品危机（例如地沟油等），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变迁背景的。

走向自己的反面

亚洲民主运动的“反民主”性，也表现在人们所追求的民主价值观，反而随着民主化的到来而消失。民主不仅仅是动员和选举。动员和选举只是民主的工具，而非民主的价值。当



民主使得社会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的时候，民主所包括的价值也会荡然无存。这对中产阶级来说尤其如此。在很多社会，中产阶级往往是追求民主的主体，但中产阶级所追求的价值，往往消失在民主化过程之中。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对欧洲的民主有深刻的反思（见前一周本栏文章）。他讨论的是欧洲，但亚洲社会更是如此。

这里，最近德国的畅销小说《看谁回来了》（Look Who’s Back）（台湾翻译成《希特勒回来了》）值得人们阅读和思考。这本书自 2012 年出版以来，已经成为德国历史上最为畅销的小说之一。希特勒是德国民主的产物，是被人民选举上来的。为什么希特勒被选举上来？因为当时德国民主失败，无法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希特勒几乎成为当时德国社会很多阶层的“救世主”。但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马上就演变成为专制。今天，那么多德国人开始“怀念”希特勒，和现在德国与欧洲经济状况的恶化有关，人们同样希望“救世主”的出现。当经济状况恶化的时候，民粹主义式的民主的机会就来了，因为很多社会群体，包括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失业者、学生、穷人，都会支持具有无限魅力的“救世主”的出现。《看谁回来了》描述的就是社交媒体是如何动员这些社会不满要素的。不过，一旦“穷人”当道，民主必然走向专制。

实际上，今天出现在很多亚洲社会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民主（化），也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除了绝少数抱有政治理想主义的人物外，大多数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同样也是对经济状况不满和对自己前途感到渺茫，幻想着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改变这种情况而已。

对这些社会的当权者来说，也可以看看当时的欧洲，是如何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回归正常民主的。这里，不得不惊叹于美国马歇尔计划的伟大。是马歇尔计划重振了欧洲经济，为欧洲重新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一个贫穷的西欧有可能倒向当时的苏联集团。不管怎样，当时的苏联是以“穷人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形式出现的，也受当时很多西欧国家知识分子，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的支持。

寻求质量民主仍然是亚洲最为艰巨的任务。如果找不到，民主永远会成为政治麻烦的根源。一旦民主促成了经济的沦落，本来已经是越来越小的中产阶级，必然成为牺牲品。一旦穷人再次占据多数，民主也必然演变成为专制。这是历史的铁律，亚洲社会也很难逃避。

（文章原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冷战之殇】

杨际开：天皇制民主的诞生

杨际开，研究十九世纪末期的东亚国际政治，主攻晚清变法思想史，近年来提倡东亚大和解。现供职于杭州师范大学。

“

美国在日本推行民主化的主要目的是要在亚洲建立一个反共产主义的防洪堤，作为精神层面的天皇有利用价值。

”

道尔(John W. Dower)的《拥抱 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引用只注页码)汉译本全书七十万字，由《胜利者与失败者》、《超越绝望》、《革命》、《民主》、《罪行》、《重建》六部共十七章组成，数据翔实，结构严谨，利用当时的照片与漫画，重现了日本从战败到重建的历史过程。这部在十年前出版的大作译笔也细腻流畅，读起来津津有味，可以获得视觉与史识的双重收获，对厘清东亚的近代进程提供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展望台。

本书虽然是为英语读者而写，但是也有中国读者感兴趣的地方，如美国对日本战后重建的政策决定的过程、天皇的角色定位以及战后日本的重建与东亚的关系等。

这是一部研究文明触变（acculturation）的著作，作者在序言中讲得很清楚：「尽管日本战后最终以一个保守国家的面貌出现，然而和平与民主的理念已经在日本落地生根——不是作为假借的意识形态或强加的幻想，而是作为一种生命的体验与牢牢掌握的契机。」「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两种文化交汇的历史时刻，比这更强烈、更不可预知、更暧昧不明、更使人迷惑和令人兴奋了。」（序言，页 5）

作为美国的日本专家，他写道：「战胜者引入的改革，对于日美两国来说都是不合时宜的。它们反映出被美国的新政态度、以劳工运动为基础的社会改良主义与权利法案的理想主义所严重侵染的构想，而这种倾向在美国本土正处于被否定或者受忽视的过程之中。此

种构想从未被引入美国在亚洲的其他占领区域，譬如南朝鲜、日本本土南端的冲绳以及琉球群岛。在那些地方，严酷的战略考虑占了上风。」（序言，页 8）这段话点出了美国以一种全球战略的文化方式来处理战后日本的重建的。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出现转机，美国对日本改革方案被罗斯福新政的理想主义所浸染说明，日本的重建也是危机后世界资本主义体制复苏与重建的一环。

「和平」与「民主」是两种不同文化交汇时的共同主题。这是如何作为生命的体验进入到日本社会中去的正是本书的主题。占领军对日本进行改造计划背后，有一种日益增长的紧迫感：「日本不仅应当以『民主化』来阻止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同时还要摆脱共产主义影响的上升。」（页 45）为此，美国占领军要从事的是：「重建一个战败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并逐步改变其民众的思维方式。」（页 47）如何才能完成这一社会工程?这当出自占领军与战败国双方的需要。然而，作者指出：「对美国的改革者们而言，这场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其近乎肉欲的兴奋快感，来自于使东方的敌人改变本性，将其转变成一个至少近似于他们可以接受的、健康的、西化的国家。」（页 49）书中，处处可以看到作者对占领军出发点的批判性言辞。

由美国主导的改革从政教分离开始，在二年内，扩展到民法和刑法改革，废除使男尊女卑合法化的家族制度，赋予妇女参政权，警察分权化，制定保障工作条件的进步法令，改善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革新选举制度，以及促进针对中央政权的地方自治。其中最重要的是推动日本政府出台新宪法。但是，以战胜与战败的形式进行的两种文化的接触最初是通过一种不平等的性关系展开的。在第八十页，登载了一张孩子模仿美国大兵和日本妓女的游戏照片，作者写道：「当孩子们长大一些，游戏渐渐变成了实践。新闻界留意到，遭取缔的妓女中包括年仅十四岁的年轻女孩，而学校里的男生们与孤儿和流浪儿一样，很快就学会了当皮条客挣零花钱。」（页 81）在美国向日本推行民主革命以前，日本社会已经在占领下出现了性道德的扭曲。

美国是如何在战后日本进行「自上而下」的革命的？这是本书的着眼点之一，服务于占领军的美国作战新闻处的文化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孔（Clyde Kluckhohn）和亚历山大•莱顿（Alexander Leighton）认为，「作为日本至高无上权威的天皇，根本上就是个空虚的容器而已，就像天皇可以作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化身被供奉一样，他也可以变身为某种帝制民主的象征被追随」。（页 192）这成了占领军利用天皇推进民主改革的依据。对日本战后重建的设想是从东北亚的时局出发的，因此，并非是研究日本的学者，而是研究中国的学者的识解受到了重视，如曾经担任过蒋介石美国顾问又是哈佛近代中国研究开拓者费正清



的老师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认为，「战后亚洲『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日本的彻底的民主化，连同全亚洲领域的经济实力最大化。不然的话，日本迟早会重蹈剥削掠夺式的帝国主义政策」。（页 194）这意味，美国对战后日本重建的着眼点眼点在于政治民主上。

在占领军干预下制定的《新教育方针》指出，「明治时期以来的近代化，注重西方文明的物质方面，但是忽略其背后的基本精神」。（页 221）这其实是对近代日本奉行的魏源「以夷治夷」哲学的纠正。笔者认为，明朝的「倭寇」——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明末抗清志士乞师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入侵亚洲是日本在响应全球化挑战中逐渐升级的过程。倒幕运动的冲击来自鸦片战争，但是再建日本的模式则来自魏源在《圣武记》仲介绍的满人在东北统合部落的经验。因此，日本长州藩的倒幕志士吉田松阴（1830-1859）有入侵东北亚的想法，这种想法与「逐鹿中原」的想法表面上是一致的，但目的是要维护一个与中国皇权对立的虚拟权威——天皇。这是对东亚文明整体安全的一种承担意识，吉田是从魏源等晚清变法思想家对美国民主制的赞叹中获得了在日本推动伦理革命的暗示的。以后，日本在东北搞满洲国的动机虽说是要建立「东亚王道」，而方法是建立近代国家式的「西方霸道」，恐怕教祖还是魏源。因此，战后日本的重建其实也是对魏源哲学的否定，具有东亚文明的整体意义。

日本共产党领袖野阪参三 1945 年 4 月，在延安提出，反对「国家制度」的天皇制，但是天皇作为宗教领袖的更为广泛的问题，可俟真正的人民民主体制建立以后，交由民众投票选举解决。日本共产党把天皇的权威排除在「真正的人民民主体制」的建设之外是对传统的误读，而作者又混淆了作为「国家制度」的天皇制与作为宗教意识的天皇。笔者认为，应该从儒家政治伦理的角度来理解作为虚拟权威的天皇，此时的天皇起到了法原——秩序重建的媒介作用。作者从日本共产党提出「粮食先于宪法」的口号，认为，「与战前的立场一样，日本共产党更加倾向于关注打倒『封建遗制』或『反动政府』，而不是权利的创造与扩张」。（页 246）由此可知，美国在日本推行民主化的主要目的是要在亚洲建立一个反共产主义的防洪堤，作为精神层面的天皇有利用价值。

作为全书核心的第四部《民主》由六章组成，前三章讲了天皇制的重建过程，后三章讲了战后民主宪法的制定过程。对天皇战争责任的免责是从天皇制在维持秩序的功能上考虑的，而这一考虑又贯彻了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与反共产主义的双重目的。也就是说，美国为了贯彻他们的价值也需要利用天皇的既成权威，这已经是一种权利在新的文化前提之下的创造，也是全球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经验。与这一经验形成对照的是中国自从上世纪七十年



代后期开始的改革开放也是利用既成权威来推行现代化，但民主本身是缺位的。顾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淡化权威」是指从抗日战争的胜利中获得的毛泽东的政治权威，他在日记中认为中国将进入经济建设的推论前提是田中角荣访华以后中日关系得到改善，中国对周边的环境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

时代课题从敌对走向和解，由战争所建立起来的权威也面临意义的转换。天皇制民主是东亚文明史上最高政治权威理性化的产物，在与西方民主制相遇以后，通过自身的意义转换达成的，这是东亚文明整体面对西方挑战的经验，可以说是一种文明触变，因此对东亚文明中的各国都具有典范意义。因为「道」作为一种秩序理念是泛东亚文明的。

第五部由《胜者的审判，败者的审判》与《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两章组成。作者在序言中写道：「1853 年，一支四艘军舰的不起眼的美国舰队抵达日本，强迫日本实行开放；1945 年，一支庞大的、耀武扬威的美式『无敌舰队』再次来临，迫使日本关起大门。」（序言，页 1）这还是一种西方中心的日本观，台湾大学的徐兴庆教授指出，吉田松阴的弟子长州藩武士高杉晋作通过 1862 年千岁丸的上海行，发生了从攘夷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态度转变（高明士主编《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儒家思想篇》，台湾大学历史学系，2003，页 236-237）加拿大约克大学的中日关系史家傅佛果(Joshua A.Fogel)也认为，1862 年千岁丸的上海行是中日关系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A Decisive Turning Point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The Senzaimaru Voyage to Shanghai of 1862,Late Imperial China Vol.29,No.1[June 2008]:104-124,by The Society for Qing Studies 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长州藩的年轻武士在这次上海行中发现已经无法在条约体制下的中国找到适合自己的商业利益，于是，开始了倒幕运动

从 1862 年开始的倒幕运动到 1942 年日本达到版图扩张的巅峰时期的八十年间，日本完成了作为西方的反抗者向亚洲的侵略者的转变。如何定罪日本确实是一个难题，可以定罪日本的还是亚洲受害国的人民。但是日本入侵亚洲的目的是抵抗西方殖民者，问题出在「以暴易暴」=「以夷制夷」的行动原理上，而这毕竟还是西方的法与逻辑。以西方的法与逻辑来反抗西方是没有出路的。这个教训无论对日本，还是对中国都同样有效。二十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以要求西方式自由民主始，以受到西方制裁终只是最近的例子。其实，在清末民初，沈曾植、金蓉镜、马一浮就已经认识到师夷必为夷所制的道理，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更新传统内部的人文资源来响应西方冲击。

最后，日本的重建意味极权主义官僚政治的重建：「这种占领时代的官僚构造，草率地建立在败战前日本固有的战时官僚制度之上，在 1952 年之后被日本人精明地延续下来，以守



护他们新的资本主义。」（页 531）在美国的考虑中，推动亚洲的现代化是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同时进行的，这个进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开始转变为冷战体制，而到七十年代才开始对中国有所缓解，于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权威政治与日本的国家利益中心的「民主政治」发生了冲突。日本战后形成的官僚体制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官僚体制是一对目的相反而结构相同的孪生子。

作者基于战后日本重建的经验，在结语中写道：「事实表明，一个国家不必继承儒家文化，就能推行独裁政治、权威崇拜、和合第一、舆论一致以及自我束缚。」（页 549）如今，东亚的权威主义官僚政治面临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要克服这一危机就需要改革官僚政治，这需要东亚不同地域的人民利用各自地缘政治的优势，携起手来共同打造东亚道德共同体。关键的问题是要重建儒家的政治伦理，而天皇制民主的遗产将在未来的东亚民主秩序愿景下得到新的继承与发扬。

载《二十一世纪》，2009 年 12 月号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曹思源：韩国社会转型的几个拐点



曹思源，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

“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韩国为社会转型奋斗了 30 多年，其间发生了许多政治事件。人民与政府在反复冲突中前进。韩国民主宪政体制的最终确立首先应归功于人民不屈不挠地为捍卫自身权益而奋斗，而一些开明的政治领袖顺应潮流的举措使这个国家没有发生特别重大的社会动乱，也是社会转型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韩国为社会转型奋斗了 30 多年，其间发生了许多政治事件。人民与政府在反复冲突中前进。韩国民主宪政体制的最终确立首先应归功于人民不屈不挠地为捍卫自身权益而奋斗，而一些开明的政治领袖顺应潮流的举措使这个国家没有发生特别重大的社会动乱，也是社会转型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首任总统李承晚被迫下野】

韩国第一代领导人李承晚，曾是大韩民国的创立者，但晚年成了阻碍民主进程的专制者。1960 年韩国大选，李承晚不甘于退出执政地位，用一些不合法的手段操纵选举，使这次选举成为导火索，激起了韩国人民为民主而斗争的火焰。1960 年 4 月 19 日，10 万多名首尔市区的大学生和高中生潮水般涌上街头，180 多名学生和市民在警察的枪口下失去了宝贵生命，是为震惊世界的“4？19 事件”。

在这场民主运动中，韩国国民意见空前统一，大众也没有被莫名的恐惧感吓倒。长期的垄断政权以及对民主主义基本原则的蹂躏让国民的愤怒爆发了。反对党民主党获得了国民的全面支持，大学教授在关键时刻加入示威行列，也起到了社会良心的表率作用。民众纷纷要求李承晚下野。国民议会一致投票支持这一要求。在国内外重重压力下， 1960 年 4 月



26 日，李承晚发表下野声明，再度流亡美国夏威夷。长达 12 年的李承晚政权就这样进入了历史博物馆。

【军事专制与民主运动的反复博弈】

李承晚专制政权垮台后突然放松的官僚阶层出现了大规模腐败的机会。专制政权遗留的社会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出现了新的官僚严重的腐败问题，这种情况后来为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条件。

1961 年 5 月 16 日破晓前，朴正熙少将率领韩国军人发动政变，一度推翻了民选政府。但迫于关注宪政的美国政府的压力，又不得不恢复了民选政府。尔后，朴正熙辞去军职参加大选，顺应韩国民众求稳定、求发展的要求，在竞选中获胜，连任三届总统，执政长达 16 年（1963-1979）。

朴正熙任内社会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韩国的 GDP 在 1969 年首次超越朝鲜。1962 年到 1980 年，外贸出口总额从 5670 万美元增加到 175 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也从 87 美元增加到 1510 美元，这一速度被称为“汉江奇迹”。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在这段时期，朴正熙依靠专制手段贯彻实施其政策。所谓“维新体制”使他得以通过严密控制的选举程序实现无限期的持续执政，并保证他在立法机构中拥有稳定的多数，这些做法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

1979 年 10 月 26 日，朴正熙被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枪杀。时任保安司令的全斗焕发动肃军政变，掌握了军部实权。

1980 年 5 月，全斗焕以武力血腥镇压光州学生和市民的民主运动，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光州“518 事件”，死伤总数逾千人，并把异议人士金大中、金泳三等以幕后黑手的罪名拘捕入狱，甚至判处金大中死刑，只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才将金大中驱逐出境。金大中在美国期间，继续从事反对全斗焕军事专制和争取韩国民主化的工作。

1980 年 8 月 27 日，全斗焕在根据维新宪法设立的选举团中被选为总统。“518”运动被镇压后，慑于政府高压，韩国新闻媒体也暂时沉默。政府在提到这个事件时，只轻描淡写说是“光州事件”。

但是，光州事件的血光始终笼罩在全斗焕身上，挥之不去。各政党再度组织起来，恢复了一切政治活动，全斗焕不得不解除军事管制。



【韩国政治转型的拐点】

1987 年 6 月 10 日，在民间的强大压力下，全斗焕宣布不再竞选总统，让其得力助手卢泰愚将军出选。由于全斗焕违反民主普选承诺，对卢泰愚的任命引发了首尔及其他大城市大规模的民主示威游行活动。

在民主化抗争达到最高峰的 6 月中旬，国际奥委会给韩国政府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动乱继续扩大而无法收拾，将取消韩国的奥运主办权。”这个严厉警告，让当时的主政者不得不认清时势。为了政权不被摧垮，只能顺应民意，作出历史性的抉择。

1987 年 6 月 29 日，为了平息国民的不满，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兼总统候选人卢泰愚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姿态，通过电视发表了 “6？29 民主宣言”，接受反对派的要求：采纳直接总统选举制、赦免反体制人士、扩大和保障人权、保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政府不干涉大学、恢复政党活动自由、开展政治对话等。“6？29 宣言”揭开了韩国民主化进程的新纪元，使得韩国的政治转型走向拐点。

1987 年 10 月宪法修正拉开了韩国宪政民主的序幕。根据这一修正案，直接选举替代了间接选举，自由与公平的选举竞争制度得以恢复。《大韩民国宪法》经全民投票通过 ，是韩国成立以来第九个宪法文本，代表了民主的胜利，标志着宪政民主制度在韩国的确立。

1987 年 12 月 16 日，进行了首次民主总统选举，但反对派阵营为推举金泳三还是金大中出选产生内讧。最后，卢泰愚顺利当选韩国第十三届总统，成为自朴正熙之后首位民选总统。卢泰愚开创了韩国民主选举的先河。

【金泳三开高官公布财产的先河】

1990 年 1 月一个出人意料的新形势出现了：执政党民主正义党为了冲破自己在国会的少数地位形成的障碍，设法把金泳三的统一民主党和金钟泌的新民主共和党纳入了执政阵营。这三个政党合并为民主自由党（民自党），在立法机构中掌握了 2/3 的多数。

1992 年 12 月金泳三当选总统。他是 32 年来韩国第一位文人总统，也是长期为韩国民主化而斗争的人士。金泳三上台后大胆采取措施，扩大政治参与，并为“5？18 运动”死难者建立国家公墓，将光州事件爆发日定为“韩国民主运动纪念日”。

金泳三宣誓就职的第三天，便向全国公布其个人及家庭成员的财产。之后，政府各部门高官、国会议员、司法高官均上行下效，陆续公布个人和家属的财产。金泳三政府还进行政



治体制改革，按民主形式进行选举，与各在野党开始合作。此后，韩国又经历了深谙世界民主政治精神要义的领袖金大中时代和卢武铉时代，民主化进程稳步前进，步入更加健康成熟和稳定的轨道。

1998 年 2 月，屡败屡战的民主运动领袖金大中，在年逾古稀之时当选为韩国第十五届总统。新政府上台后，提出“民主和市场经济并行发展”的政策，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推行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使长期以来官商勾结、“官治金融”和大企业集团盲目扩张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理。

2001 年 11 月 8 日金大中因执政党在国会议员补选中失利，辞去民主党总裁职务，表示不再涉足党务，集中履行总统职责。

2002 年 12 月 19 日新千年民主党候选人卢武铉当选韩国第 16 届总统。

【卢武铉：第一位被弹劾的韩国总统】

2004 年 2 月 24 日，在就职一周年“特别电视座谈会”上，卢武铉谈到“我期望国民大力支持开放国民党”。在野党认为卢武铉“违反了选举法”，抓住该把柄不放。在韩国中央选举委员会警告总统要彻底遵守“选举中立”的立场后，新千年民主党要求卢武铉在 3 月 7 日前向国民道歉，否则将动用弹劾程序。但卢武铉一直拒绝道歉。2004 年 3 月 9 日韩国在野的大国家党和民主党向国会提交了弹劾总统卢武铉的动议案。2004 年 3 月 12 日韩国国会以 193∶2 票通过了弹劾议案，卢武铉成为韩国宪政史上第一位在国会被弹劾的总统。

随即，卢武铉的总统权力被暂时中止，由总理高建代行总统职权。此后的 6 个月内，韩国朝野双方要在宪法法院举行数次公开辩论，并最终由 9 位宪法法官投票，如果得到 6 位法官的支持，总统弹劾案即生效。

韩国《朝鲜日报》与韩国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显示，反对弹劾总统的占 53.9%，赞成的占 27.8%，不表态和拒绝回答的占 18.3%，反对弹劾的比率几乎是赞成的 2 倍。

2004 年 4 月 15 日国会大选结果揭晓，卢武铉所在的开放国民党获胜，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5 月 14 日上午韩国宪法法院以多数票驳回了国会的弹劾议案，并宣告立即恢复卢武铉的总统职务。



在这前前后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韩国没有陷入无政府主义，没有发生社会动乱，没有发生打砸抢烧杀，军队和警察也没有发生异常调动及越权行为。拥护与反对弹劾的两派民众及政党之间，也没有发生互相冲击，更没有暴力冲突。整个社会都在宪政与法治的轨道上等待并遵从宪法法院的最终裁决。

弹劾案依程序提起又依程序否决，显示韩国渐进式的宪政转型经过艰难的磨合期，进入了成熟的发展阶段。

卢武铉复职当日，我正在韩国讲学。那天满街都是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晚饭后我出门散步，见朝鲜日报社北边正在举行露天集会，大约三百多人张灯结彩，男男女女逐个登台演讲，井然有序。会场上有人赠送鸡蛋给我。回到宾馆里，朋友告诉我：这跟复活节的含义一样，今天总统“复活”了，为此大家吃鸡蛋庆贺。我问：“鸡蛋是不是煮熟了？”“那当然！”于是当夜我就痛痛快快地把两个鸡蛋都吃掉了。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独立之困】

秦轩：民主化后，缅甸会走上印度的老路吗？


秦轩，南方周末记者。

“

东南亚地区自古就受周边强大外来文明的冲击，近代沦为多个西方殖民国家角逐之地，地区自身的民族国家建设，几乎可说是角逐的副产品。其必然在该地区民族国家独立后产生复杂的结构性问题，从而导致政治生态的多样化。在这片地区有威权有民主、有列宁、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体制也有君主立宪。在缅甸则是 1945 年后罕见的军人长期执政与内战。

”

今年 3 月，我第二次参观仰光，距离上次去大约 11 个月。两次参观接触了本地新闻同行、民主斗士、参议员和官员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年轻人。尽管两次都是匆匆而行，但印象深刻，已经足够引起思考，构成猜想。

东南亚地区自古就受周边强大外来文明的冲击，近代沦为多个西方殖民国家角逐之地，地区自身的民族国家建设，几乎可说是角逐的副产品。其必然在该地区民族国家独立后产生复杂的结构性问题，从而导致政治生态的多样化。在这片地区有威权有民主、有列宁-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体制也有君主立宪。在缅甸则是 1945 年后罕见的军人长期执政与内战。

政治生态密集分布，对于喜爱考察后发国家近代化的人而言，显得很有趣。而缅甸则因为其国家规模和新近民主化转型，成为关注的焦点。

同时，缅甸的邻国印度恰提供了后发国家民主化的成功经验，可以作为比较的参照物。个人愚见，若是看到缅甸民主化转型，不想到印度简直是怪事。何况缅甸的近代化原本与印度密切相关。最后一个缅甸王朝覆灭，替英国人管理缅甸事务的，是印度人。昂山将军在



赴伦敦谈判独立事宜前夕，在德里特意停留考察管理经验。昂山素季的童年，也在印度度过，这背后有其大历史的逻辑。

仰光在我两次参观间发生的变化，可喜而惊诧。道路、基础设施似乎更为完善，出租车整体更新，车窗外偶尔闪过的钢架玻璃式建筑，象征着这个国家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有多迅速。而且，貌似连停电的次数也减少很多。

消息说 2013 财年缅甸的贸易额增长超过 1/4。中、美、日、印、韩在缅甸的投入更多更活跃。随便在仰光街头走一走，问一问，乐观与期待随处可见。可是，随着缅甸新一轮大选的临近，我却依然怀疑，目前的增速是否只是因为底子太薄，闭塞太久。变革的能量是否持久，新鲜感是否会退却？严格说缅甸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政治、安全、经济、产业结构，人们的智识观念依然不容乐观。假设军人的影响的确削减，假设缅甸民主转型基本成功，我依然对其未来数年乃至十余年的发展保持更为谨慎的态度。这是因为，它有些问题实在和上世纪中叶的印度有可比性。而印度民主所呈现的局面，尤其是问题则很可能在缅甸重演。比如发展速度缓慢，社会-政治集团间的沟通效率很低，政党间核心议题是如何瓜分公共资源，而非推动私有市场经济的竞争。党派或政治大佬会为了获得票仓，将公共资源视为钱包，以公共资源收买支持者。一般性的公共事业反倒会缺少资源投入，发展缓慢。这些问题在后发国家的民主化中多少都会出现，在印度尤其严重。缅甸又将如何迎接新的挑战呢？不得而知。

国家共识仍需整合

缅甸的第一大难题依然是建构国家共识，实现整个版图的政治一体。明摆着的在缅甸建构现代国家共识，比在印度更难 100 倍。缅甸各地区纳入一个国家范畴的时日比印度少不了多少，但独立建国的思潮和运动极为仓促。1885 年缅甸的末代国王刚被英国人赶下台，并被纳入到印度范围统一管理，直到二战前夕。所有后发国家的现代民族主义者都是在西式学堂学出来的。没有英国殖民就不会有印度国大党。1885 年，印度国大党已经成立，而缅甸第一代展开现代民族国家运动的精英才开始念英文。

在前现代农业佛国，培养新意识的人，就像新的物种，需要规模、代际传承。英国殖民的时期短，意味着缅甸人浸淫现代民族观念的历史太短。印度至尼赫鲁一代，已经十足的英国范儿，视野与世界同步。客观说，昂山将军从政前的教育与社会经验履历，与甘地或尼赫鲁均无法相比。这背后是缅甸领导独立运动的精英阶层观念与业务水平欠缺。缅甸建国时民众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之薄弱和模糊可想而知。

此外，印度有甘地这样的社运大师，将毫无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统农民与精英国大党阶层整合到一起，培育出现代印度国的概念。这种量级的人物和社运过程在缅甸无法产生。对绝大多数生活在缅甸诸河流域的普通农民而言，所谓独立，无非只是把外人赶走罢了。尼赫鲁和甘地的联手，象征着印度有现代观念的上层精英和广大前现代世界人士结合，共同开创印度国。缅甸则缺少这种组合。

不过，这还不是缅甸建构国家共识的最大问题，地区民族之间的分歧显然更棘手。

在英国统治时期，英人倾向用克伦等少数民族管理缅族这种多数民族。日人占领时期，则反之多用南部的缅族。所以今天缅甸内战的格局，根源至少要倒回到英占和日占时期。各方彼此都有恩怨、猜忌。有些地区的独立诉求种子早已种下，甚至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昂山将军原本是各方的脆弱共识。他遇刺以后，原本就只是同盟关系的各方势力再无法凝聚。缅甸军政府在 1960 年代上台，时至今日，还没有终止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内战。这个国家的中央权力体系与地图边界极端不匹配，种子在英占时期就已种下。

最初和奈温搞政变的，是昂山身边那批想要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军人，不能说他们没有情怀。有学者研究，在 1945 年以后的历史中，相较于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军政府是最不稳定的。在缅甸军政府能够长期维持，本身就是奇迹。但是军政府专制的结果又必然是造成知识界和权力的隔阂，激化甚至切断跨民族间精英交流的渠道。于是不专制，国家共识无力达成，专制，国家共识分歧更剧。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当战争不再能持续。少数民族地区放弃独立，中央政权靠什么来吸引及推动国家共识的建设，将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到一整套的政治体系中呢？去年夏天我在内比都见过几个北方的少数民族议员。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哭穷，要和中央要财政上的支持。

显然，这是民主后的缅甸政府必须要面对的。反过来说，民主或许是熄灭内战的最好方法。印度是个好例子。印度的种族、教派、区域文明的分歧之多，之复杂，还要远超缅甸。但是竟然没有爆发内战，简直就是奇迹。从这个角度说，尽管民主在印度确实有消耗政治资源，极大降低公共政治议题沟通效率的问题，但却避免了成本更高的内战。

可喜地是，民主转型之后，民间知识精英得以参与国家共识的建构过程，比如和平中心的成立，让学者得以在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地区精英间建立沟通渠道。民间的交流也得以展开。据我了解，在仰光就有白手帕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成立，在仰光占据资源与知识优势的年轻人到北部山区去援助少数民族，还有民间的私人通讯社像 MYITMAKHA MEDIA GROUP，



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自己的记者、通讯员。虽然他们的力量依然渺小，但在建立互信的层面上，他们有军政府无法比拟的优势。实际上在中国，中央民族大学伊利哈木老师建立的网站维吾尔在线，功能和价值既有相通之道。

民主来了，公民没来

缅甸第二个问题几乎是后发国家民族化的通病，既民主来了，公民没来。通用的数据统计，印度的农村人口比例在 70%，缅甸也在 70%。相对而言，印度 60 年代既有过绿色革命运动，农业生产的工业化程度比缅甸要高，但问题也不少。有学者考察，由于印度农村传统，印度某些地区的土地趋于分散而非集中，工业化生产的优势发挥不出来，比如化肥的投入提升了成本，但无法规避季风性气候带来的产出不确定性。受其影响，大量农民或农业工人自杀，这在印度甚至都算不上新闻。

缅甸农村，一样受季风影响，农耕方式和百年以前差别不大。基于此，缅甸农民，更习惯于穿着传统纱笼，到寺庙或教堂里去拜神，他对于现代商业文明的契约精神、权责意识都不具备。民主化之后他们获得选票，却不会变成巴黎或伦敦的公民。当然，我并不是说缅甸农民没有民主自觉意识，不会去追求争取自己的权利。

印度民主化后的历史上，对于如何争取现代公民意识薄弱的民众（主要是农民和城市贫民窟居民，也就是非正式部门的从业者），有充足的经验和例子。其中一个教训是，孤立的个体依然无法对抗强权。警察欺凌普通民众的事件时有发生，而受侵害者维权的成本则非常高，光是走诉讼程序就能拖死你。于是，民众只有依附于群体认同，通过群体形成社会压力。而最容易形成集体的，大多是传统社群观，比如部族、地域、宗教等等，也有相对新的观念，比如阶级、黑社会或者社区认同等等。

这些现象在缅甸同样会出现，尤其在民众一人一票，政治博弈通过选举，以票仓决胜负的时候，就会出现有趣的局面——市场化政治。由于没有被纳入到近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选民占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政客的竞选方针就会向福利分配方向倾斜，许诺各种补贴、教育权、健康权等等。几天前昂山素季在她的素基金会创办发布会上，就明确她基金会的功能是推动缅甸人的教育和健康。这是对的。撒切尔夫人式的政治主张在缅甸没有市场。

绝大多数政客或党派都不敢砍掉财政，只能一个比一个更多地追加。一旦当选，公共福利和公共财政资源就被迅速瓜分，比如信用社的农业贷款，当然会是自己党派的支持者优先。而这些党派往往是跟政治压力集团挂靠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印度就是这种财政追加最终破产，导致 90 年代初不得不改革，走向市场经济。这点上说危机倒未必不是好事。问题是，当改革派国大党失败后，左派大佬经过反省，结论是正是因为收紧财政，扶植自私的商人，才导致了国大党的下台。

前现代思维的选票得罪不起，所以连像辛格这样的坚决改革派也要穿传统服装出门。我前年去采访过他 92 年改革时的首席智囊，尚卡尔•阿查里雅。他在办公室里穿的也是传统服装。

而去年在内比都，看缅甸国会议员们开会，除了军方代表，全是纱笼加马褂。如果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伊藤博文看到这一幕，不知会做何感慨。

在缅甸国会通过《媒体法》前夕，昂山素季在公开演讲中提到记者需要培训，新闻人在享有言论自由的同时也要学习怎么负责任。毕竟缅甸现在的民间媒体人还太年轻，不到 30 岁的主编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年轻人的观念未必比老派人物差。年轻人更开放和接受现代观念。我仔细看了一下，大街上穿长裤、长裙等现代服装的，几乎全是年轻人。

昂山女士的演讲不无道理。新闻行业是培养现代公民意识的要素之一。公民在绝对数量和相对全体国民的比例过少，这是民主化后缅甸面临的巨大挑战。将这个问题视为军政府的后遗症也不为过。专制社会没有培养公民的温床和空间，这也是为什么没有公民也得民主，否则更没希望。专制社会只会愚民和制造更多的顺民。绝对的权力不仅导致绝对的腐败，还会导致绝对的愚昧，并制造更多的愚昧。因为集权者痛恨自由意志，后者不便于管理。

总之，缅甸的民主化当然值得肯定，但其从失败国家到成功国家的路途还很漫长。基于两大结构性的问题，缅甸走上印度老路的情形，恐怕很难避免。可行地只是尽可能地吸取教训，让这条路短一点，不要像印度一样，自上世纪 40 年代末建国到 80 年代末之后，才开始改革。

附：仰光的城市化观感

仰光的城市平民窟规模会扩大，就像孟买。在军政府时期，仰光实际上已经控制不住了。1983 年仰光面积不到 134 平方英里，2005 年接近 307 平方英里。实际上这个扩张速度几乎与军政府逐渐放权的速度同步。



坦率说，这座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可真不怎么样， 1991 年仰光只有 37% 的住房能得到电力供应。你可以想见，在有电力支持的区域，电线一定会像蜘蛛网一样疯狂拉伸，而在其他后发国家，这种现象一般出现在贫民窟中。

没有电力的地区，则谈不上是村庄还是城市。公共设施、管道电力无力普及，其生存条件之恶劣可想而知。

在仰光还有个有趣的特点， 城市里的楼房 分两种，有电梯的，无电梯的。在政府限令下，无电梯房最高只可以建 8 层。据我观察，市面上 5、6 层的楼房居多。没有电梯，住在顶层的人爬上爬下成本会很高。于是在这些楼前经常能看到长长的绳子，从楼上窗口垂下来，绳子终端系着夹子。想必，这是楼上居民和楼下商贩或社区管理者沟通的妙招。

全国 5800 万以上的人口，仰光集中了接近 600 万人，超过全国人口的 10% 。再除去 70% 的农村人口，第二大城市曼德勒、首都内比都真剩不了多少人。民主化之后，政府的强制力必然会减弱，其他地区居民和农村人口像仰光集中的趋势只会扩大。据说现在的官方统计仰光的人口增长率是 3%。而全国的平均水平是 1.9%。

在一般情况下，后发国家农村向城市汇聚是普遍现象，缅甸也不例外。在过去，北部山区的部分少数民族居民因为隔阂太大，资源太少，选择要么待在乡下种田种罂粟，要么去本民族的文明中心。但在和平转型后，恐怕流向仰光这种大城市的趋势会更明显。

绝大部分新移民因为缺乏现代知识技能，无力在仰光的现代行业找到工作，他们只能干体力活。会用计算器或秤杆，能算帐的，自然会在街头摆摊。这样的工作投入不大，收益也不大。仰光满大街都能看到类似的商贩，在唐人街一带最为鼎盛，街道内侧是商店，外侧是一排排的摊位，有的对着人行道，有着对着马路。从街头走到结尾，要在人群里挤来挤去。或许这跟华人传统有关，在东南亚地区，华人聚集区数百年来就是商贸集散地。

除了外国人常去的旅游景点与购物地——昂山市场，街头的乞丐并不多。我猜想这和缅甸的佛教传统有关。无力生计的人在寺庙也可获得一定生存空间，同样可以出去讨斋饭，投入产出比当乞丐差不了太多。

新移民总是选择集中居住。尤其在城市周边的为开发空地聚集，在印度也是如此。要不了几年，这样的地方自然成为贫民窟。贫民窟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落脚城市。我理解这是后发国家现代化不可跨越的一步。好处是贫民窟会成为传统农村与现代都市文明对话的通道，并筛选出农村最优秀的人才。他们虽然在知识观念上差，但勤奋和野心要比城里人有干劲



的多。必须明确地是，城乡户籍隔离和城管的后果是社会分化，带来的风险恐怕会越来越高于容忍贫民窟。

贫民窟的坏处是显而易见的，藏污纳垢，无法纳入公共管理体系内，产权不明。所有管理者都会为之头疼。据说在今年 1 月，仰光政府在莱达雅、丁茵、德共新区这三 个地区，强制驱离无照占住者，人数估计二三万人。

这样的管理办法，大概是从中国学的。不过如果民主转型成功，这种办法就会不好使了。当年在印度，英迪拉 •甘地权倾 一时的小儿子费罗兹•甘地干过赶人强拆的事情，但却很难制度化。

从外部观察，仰光的阶层分化倒不明显，城市中产所在的聚集区看起来，和贫民窟也差不多，墙体斑驳，基本都是 3、40 年以上的房子，老旧的电表在中国二三线城市都很难见到了。比较而言，大概中产聚居区的电力相对有所保障。至于自来水是否充足都还是问题。说得刻薄一点，仰光和农村的差别，和镇子与乡村的差别差不太多。

差别不大，缅甸人对现代都市的渴望也就还没有形成潮流。在仰光的出租车上，我看过几段流行的 MTV。本地特产的 MTV，画面上一男一女，唱着情歌，拍摄水平还不如 10 几年前中国 KTV 常见的那种粤式 MTV 片子。画面上基本不会出现城市，更不会像印度人一样，跑到希腊、巴黎去取景。高级点的，就是帅哥开着汽车，低端的就是在村口、树林里小伙子拿把吉他泡妞。显然，导演的想象力被现实条件约束住了。好处是，看不到阶层差异，坐在车里的客人不会为自己不够洋气、高大上而自卑。我印象里，演员们似乎都没有穿着传统服装，而是现代的长裤、衬衣。

不同阶层的分布也在交通工具上呈现出来。仰光有一圈环城铁路，大约 46 公里长，39 个站，一圈下来要走 3 个多小时。据说，每天有 13 万人次的乘客，一年则有 4800 万。铁路两边，就是城乡结合部地带。铁路的服务对象，大致也对应着仰光的边缘人群体。

城市里，运营的交通工具有三轮车、出租车、公共汽车、小巴以及很像小货车改装的运输车，样子有点像微缩款的运兵车，车的后厢是个大篷子，里面两排可以挤下十几个人。我在街上注意到一个穿着整洁的胖丫头坐在篷车后面，悠然自得的打电话。看样子坐这种车对于普通城市平民来说也是习以为常的。

去年夏天，在仰光街头还能看到破旧的二手出租车，很像是黎巴嫩、伊拉克这种经过战乱的国家流行的那种，每辆车的年龄都至少在 30 年以上。可是今年明显不同，绝大部分出租



车都变成了白色的准新车，车上还贴着日式的标签，车载 GPS 里显示的也是大阪、横冈之类的地图。这些车大概是日本人新援助的。

相应的，城市的面貌也有变化。在出租车里，我突然看见有崭新的钢架结构加玻璃墙式的建筑，简直惊呆了。街头有些老楼的正面重新粉刷，看着也有了点朝气。最有价值的证据可能是电力供应。此次在仰光三四天，只遭遇一次停电，可见进步之神速。

这些当然是乐观的变化。再有就是见到昂山素季，她竟然会在公开场合发脾气，很有震慑力。我原来觉得她的政治经验实际上并不足，恐怕只适合当偶像，不适合做政治家。现在看，她还是蛮有气场的，或许真能玩的转。

最后说说对寺庙的观察。我去过中东、欧洲、和东亚不少宗教场合，但很少遇到在晚上还让人随便呆着或祈祷的庙宇教堂。这点上说，缅甸的佛教寺庙显得很开放。在大金寺旁有个小寺，寺内还有池塘。我注意到晚上会有人在寺里虔诚祷告，而年轻人则聚集在池塘边谈天吃零食玩手机。

可见这种宗教与其日常生活嵌入的紧密程度，恐怕连清真寺都比不了。

说起大金寺我还有个地方没想明白。仰光成为首都是 1880 年代的事情，但大金寺历史久远得多。这个寺的精致程度，确实让我吓一跳。东亚地区很少见，中东地区还有的一比。一般来说，这种寺是城市的地标，其规模大概也象征着城市的地位。以此而论，仰光在缅甸的前现代历史上，也该风光过才对。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尹鸿伟: 缅甸的罗兴亚难题



尹鸿伟，中国《看世界》杂志首席记者。

“在缅甸的罗兴亚人基本不能接受高等教育，又没有缅甸公民身份，因此他们中很难产生精英阶层人物，整个群体长期处于底层与边缘状态。在缅甸若开邦，当地若开族与罗兴亚人的矛盾也一直尖锐存在，并且随时发生暴力冲突，其中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种族与宗教的因素。”

“媒体和公众更愿意关注缅北和克钦问题，其实随时可能爆发的是缅孟边境问题。神经中枢在若开邦，若开乱则天下乱。”2014 年 5 月末，缅甸国防部发言人昂道少将公开表示，若开邦边境已经成为目前局势风险所在，超过缅北及克钦邦情势更令人揪心。

自 5 月初以来，缅甸若开邦与孟加拉国接壤边境连续发生武装冲突，造成双方多人死伤，其中包括缅甸和孟加拉国的边防武装人员，以及罗兴亚团结组织（RSO）的武装分子。随着缅甸和孟加拉国均有向冲突发生地区增兵的趋势，罗兴亚人（Rohingya people）的问题一时间超过了缅北克钦邦持续了三年的战火，再度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拥有 6000 万人口的缅甸视佛教为国教，全国有近 90%的人信仰佛教，约 5%信仰基督教，3.7%信仰伊斯兰教，0.5%信仰印度教，还有 1.21%信仰泛灵论。缅甸军事政治问题专家耶博雍籍牙说：“缅孟边境武装冲突是延续千年的佛教与伊斯兰教之战的继续。长期以来，罗兴亚人的问题始终是缅甸和孟加拉两国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

宗教宽容度的急剧降低，已经被视为成为缅甸政治转型中最阴暗的一面，尤其是对穆斯林群体及罗兴亚人的排斥。目前，罗兴亚人分别居住在孟加拉国（约 100 万）、缅甸（约 40 万）、巴基斯坦（约 35 万）、沙特阿拉伯（约 40 万）和阿联酋、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共约 10 万）。由于其不断发生迁徙，因此还有数量不明的罗兴亚人不断出现在周边国家，包括中国云南边境。



“缅孟夹缝中的人”

颠沛流离，几乎可以成为缅甸数十万罗兴亚人最真实的写照。这个信奉伊斯兰教说孟加拉语，从外观乃至文化上来看都是南亚人的群体，却自称是到孟加拉湾经商的阿拉伯人后裔，坚持认为是缅甸 130 多个少数族裔中的一支。

但无论缅甸政府或者缅甸民众一直不愿意承认和接受罗兴亚人，认为他们基本是英国殖民缅甸期间移民到缅甸的，甚至是英国人的帮凶。历史上，罗兴亚人还多次发动武装暴动，企图分裂缅甸领土独立建国，因此一直遭到缅甸政府的打压；同时由于罗兴亚人的犯罪率极高，这个群体与缅甸佛教徒关系始终非常紧张。



（资料图：缅甸若开邦北部，一处罗兴亚人的住所。 ）

传统上，罗兴亚人主要居住在缅甸若开邦北部与孟加拉国接壤的貌夺和布帝洞镇区，由于他们是缅甸比较大的一个穆斯林群体，因此习惯上也被称为“穆斯林若开人”。目前，缅甸的穆斯林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除罗兴亚人外，还有英国殖民时期从印度到缅甸的印度裔穆斯林，以及从中国、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移民到缅甸的穆斯林。当然，还有观点认为缅甸本土也有一部分穆斯林，包括各种穆斯林融合后也有不少后裔。

缅甸官方认为穆斯林总人口仅为 220 万，但缅甸穆斯林自认为拥有 800 万之众，而罗兴亚人人数大约为 40 万，所占比例不算最大。虽然罗兴亚人来源的说法有很多种，但比较普遍



的观点是：罗兴亚人是阿拉伯穆斯林、阿富汗人、摩尔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和孟加拉人等的直接后裔，他们大多在英国殖民东南亚时从海上来到缅甸若开地区，尤其是从当时的东印度被殖民者征用到缅甸做劳工。另外，由于 1971 年 3 月才脱离巴基斯坦独立建国的孟加拉国当时同处于英属印度统治之下，因此罗兴亚人很容易由西向东大量移民到同样是英属殖民地的缅甸。

罗兴亚人一般都是农民或渔民，他们和若开邦当地信仰佛教的若开族时常发生矛盾。尤其在二战中，罗兴亚人站在英国一边，与占领缅甸的日本军队进行对抗，而若开族则和缅族一起发起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因此双方之间的长期争斗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信仰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有自己的语言，但文字不成熟，没有字母表。曾经，部分罗兴亚知识分子试图发明新的字母表来复活其语言，但这一尝试没有取得成功。罗兴亚民族组织认为，在 1948 年缅甸独立之前罗兴亚人就有 150 万，他们曾经要求与英国单独谈判成立伊斯兰教地方自治政府，因此独立后的缅甸政府认定其为妄图分裂缅甸，并且改变缅甸佛教社会特性的分离主义者。

在 1948 至 1962 年期间，缅甸吴努政府曾给予罗兴亚人一定的政治地位，缅甸议会 18 名若开议员中便有 4 名罗兴亚人的代表，另外还有罗兴亚人在政府中任职。但随着伊斯兰分离主义在罗兴亚人之间的兴起，其后的缅甸军政府开始扭转对罗兴亚人的态度，甚至施与军事手段驱逐。从 1962 年起，执政的吴奈温军政府逐步认定罗兴亚人为外来人群，非缅甸土著民族，并且不再允许其成为政府人员和军人，以及通过没收身份证等办法剥夺其缅甸公民身份。





（资料图：缅甸若开邦北部，正在进行穆斯林朝拜活动的罗兴亚人。）

1982 年，吴奈温政府颁布了新的《缅甸公民法》，更是千方百计从法理上排斥了罗兴亚人，同时采取军事手段清剿若开地区的反政府武装。这些政策一直延续至今，最恶劣的后果便是造就了大量的罗兴亚人逃亡成为难民，其中孟加拉国成为最大的避难国，目前仍然是联合国最为关注的问题地区之一。

罗兴亚人与孟加拉也是不同民族，因此孟加拉国政府一直也不承认他们是孟加拉人，也不断千方百计进行驱逐，使他们长期成为“缅孟夹缝中的人”。不过，包括印尼、埃及、沙特、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传统穆斯林国家都对缅甸罗兴亚人的处境表示关注，并不时对缅甸政府提出批评，部分伊斯兰成员国甚至敦促联合国以“反人类罪”起诉缅甸国家领导人。包括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恐怖组织、印尼极端伊斯兰组织也已经向缅甸发出恐怖威胁，誓言将报复缅甸对罗兴亚穆斯林所犯下的“罪行”。另外，还有充分证据表明罗辛亚民族团结组织加盟了塔利班，其部分骨干人员已在孟加拉国被捕。

耶博雍籍牙认为，由于罗兴亚人没有自己的祖国，靠别人收留很难解决根本性问题，但要成立一个罗兴亚人的国家，显然缺乏足够的条件。2014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缅甸进行了自 1983 年之后的首次全国人口普查，但政府人员仍然将罗兴亚人排除在 135 个民族之外。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为此专门与缅甸总统吴登盛进行过电话交谈，但缅甸政府坚持不承认他们是“罗兴亚族”，也不进行人口信息登记，继续认定他们“是孟加拉国移民，不是缅甸公民”。

大量沦落为难民

在缅甸独立前，若开邦北部的罗兴亚人就自行组建了武装，试图形成自我管理。1960 年前后，罗兴亚人和其他一些穆斯林甚至要求把这个地区（1961 年曾经成立一个马由国界行政区）并入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前身），引起了缅甸政府的不满。

缅甸独立后，由于采取政治和军事手段软硬兼施，罗兴亚人的反叛形势曾经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各种矛盾在吴奈温上台后激化，缅甸政府坚持在政治、经济和宗教，土地分配及自由迁移等方面设置了诸多的限制，造成大量罗兴亚人不断迁往孟缅边境地区的管理空白。按照联合国难民机构的数据，至少有数十万罗兴亚人在过去的 60 多年间移居其他国家，尤其 20 世纪 70 年代和 90 年代出现过两次大规模外逃。

由于罗兴亚人反政府武装在 1974 年加入了全国性的少数民族反政府统一战线——民族民主团结阵线，同时缅甸共产党在若开邦频繁活动，因此吴奈温政府于 1978 年初起在缅孟边境的布帝洞和孟都开展了一场名为“龙王计划”的军事行动，同时打击反政府武装和缅共力量。此轮行动造成大约 20 万人逃离缅甸进入孟加拉国边境成为难民，其中包括 18 万罗兴亚人和 2 万偷渡进入缅甸的孟加拉人。由于国际社会纷纷谴责缅甸，并且发出武力威胁，吴奈温政府被迫同意接收孟加拉政府遣返的罗兴亚难民，差不多有 18.8 万人在 1979 年底以前得以返回缅甸。

1989 年底，缅甸军政府在罗兴亚聚居区建立佛教徒定居点，大量佛塔和佛寺的出现，对罗兴亚人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又导致部分罗兴亚人外逃。1990 年，由于追剿罗兴亚人反政府武装，引发了缅孟两国边防军的冲突，双方一度在边境屯兵数万对峙。在国际社会的呼吁与协调下，缅甸与孟加拉国在 1992 年 4 月签署协议，同意在“安全而又自愿的基础上遣返逃往孟加拉国的 22.3 万穆斯林难民”，但直到 1994 年 2 月才遣返了 5 万余人。目前，仍然有 20 万罗兴亚人在孟加拉国打黑工，2.8 万人滞留在孟加拉国边境的难民营中。

孟加拉国国土面积为 14.7 万平方公里，人口却超过 1.6 亿，2013 年人均 GDP 仅为 800 美元，为目前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人口大国及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由于国力衰弱，因此其近年来一直呼吁缅甸彻底解决罗兴亚人的问题，而缅甸政府的回应往往是：如果孟加拉



国愿意要罗兴亚人，缅甸可以一个不少地送过去。联合国和美国等也不断对缅甸施压，希望其接受罗兴亚人成为缅甸公民，并称此举能够停止缅甸穆斯林和佛教徒之间的暴力事件；但缅甸政府坚持认为，罗兴亚人长期以来都被当成非法移民，是一个古老的延续难题，类似情况在阿拉伯国家也很常见，例如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拒绝给予巴勒斯坦人国籍。

耶博雍籍牙表示，虽然罗兴亚人一直在坚持反政府武装斗争，并且与外界的穆斯林势力有着接触，但是其力量始终比较弱小且分散，因此很难有大规模的战争发生，同时其也很少与其他缅甸穆斯林有联合。值得注意的是，缅甸其他穆斯林还认为缅甸政府一直对穆斯林采取压迫态势，原因就在于罗兴亚人的反抗运动。2012 年，若开邦又发生了若开族与罗兴亚人的严重冲突，众多房屋被焚毁，许多宗教建筑被破坏。缅甸媒体称，仅 2012 年 6 月以来，缅甸佛教徒与包括罗兴亚人在内的穆斯林之间的激烈冲突，夺走了至少 237 条人命，并造成 14 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受害者是穆斯林。



（资料图：由于生存处境一直非常艰难，不断有罗兴亚人离开缅甸成为难民，他们通常都是先逃往孟加拉国，再乘船逃往其它东南亚国家。）

由于生存处境一直非常艰难，不断有罗兴亚人离开缅甸成为难民，他们通常都是先逃往孟加拉国，再乘船逃往其它东南亚国家。联合国难民署称，仅 2008 年下半年就有数千名罗兴亚人逃离缅甸成为难民。

2008 年底，近千名罗兴亚人乘船逃往泰国避难，但遭到泰国军人的无情驱逐。随后引擎被破坏，且缺少粮食和饮水的难民船在海上漂流，仅有一半人后来在印尼和印度海岸被救起，其余均葬身大海，令泰国政府备受指责。而缅甸政府除了否认这些罗兴亚人来自缅甸，更强调罗兴亚人不属于缅甸的 135 个民族之一，而是孟加拉人，总之不愿意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现在，仍然不断有罗兴亚人通过泰国进入马来西亚，因此泰国南部的穆斯林聚居区经常有非法入境的罗兴亚人被警察抓获，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东盟的高度重视，但却始终无法找到解决的方法。在东南亚国家中，收留罗兴亚难民最多的是马来西亚，目前约有两万余人，但是他们也只能从事最低贱的工作，并且随时有被驱逐的风险。不但历史上的罗兴亚难民很难解决，并且现实中难民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使得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无解。

由于在缅甸的罗兴亚人基本不能接受高等教育，又没有缅甸公民身份，因此他们中很难产生精英阶层人物，整个群体长期处于底层与边缘状态。在缅甸若开邦，当地若开族与罗兴亚人的矛盾也一直尖锐存在，并且随时发生暴力冲突，其中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种族与宗教的因素。

影响越来越广泛

罗兴亚难民的长期存在，已经成为影响缅孟关系正常化的一大障碍，两国差不多每年都要为此进行讨论和协商，甚至稍有不慎便爆发边境冲突。缅孟目前不存在领土争议，因此边境冲突的起因往往在于罗兴亚团结组织（RSO）的武装分子跨境活动，即很少是两国自身的原因。

进入 2014 年以来，缅孟边境冲突依旧此起彼伏。5 月 13 日，罗兴亚武装分子从孟加拉国入境，与缅甸边防警察发生冲突；5 月 17 日，武装分子又在缅孟边境伏击缅甸边防警察，造成缅警 4 死 1 伤；5 月 28 日，两名武装分子又越过边界，其中一名男子被缅方击毙，另一名逃回孟境。随后，缅孟边境的局势越来越紧张，缅甸指责孟加拉国纵容罗兴亚武装分子的扎营与活动；而孟加拉国对此完全否认，声称罗兴亚武装分子并不在本国境内，甚至反击指责缅甸长期迫害穆斯林罗兴亚人。



2014 年 5 月 15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在投资、贸易等领域对缅甸的制裁再延长一年，而且公开将其与罗兴亚人的问题挂钩，随后不少西方国家纷纷效仿，从侧面加剧了缅孟边境的紧张局势。由于这些复杂的因素，最终缅甸边防警察与孟加拉国边防军不断发生冲突，并且造成了一些伤亡。随着孟加拉国边防军向边境地段增调部队和部署重武器，缅方也毫不示弱地则派来了正规军队，双方随时剑拔弩张。不过，由于罗兴亚难民在缅甸与孟加拉国之间所影响的范围和利益有限，因此两国政府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往往冲突一番后又谈判解决，周而复始。

由于缅甸与中国云南省接壤，许多罗兴亚人也通过不同方式进入云南边境地区，以打零工、做小生意等方式居留下来，目前主要集中在瑞丽和盈江等边境城镇，大约有两至三万人。尤其 2012 年以来，缅甸政府军与克钦独立军之间的战事再次升级，以及缅甸佛教与穆斯林的大规模冲突，造成数万名缅甸难民涌入中国境内，其中多数为罗兴亚人。出于国际人道主义的考虑，中国政府目前并没有驱逐他们，而是通过办理《暂住证》的方式允许他们有条件居住，并在经商和信仰自由等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包括允许他们建盖了自己的清真寺。

除了造成不良国际影响，罗兴亚人同样给缅甸国内带来了巨大的生活安全隐患与政治困扰。2011 年缅甸新政府成立后，也不得不经常发表声明，“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缅甸的民主转型，与罗兴亚人有关的骚乱可能玷污国家形象”。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名发言人更如此评价：社会秩序的结构可能无可挽回地遭到破坏，可能危及缅甸政府正在推进的改革和开放进程……居民群体之间的互不信任越来越严重，正为反政府武装人员和犯罪分子利用，用于造成大规模的生命损失。

虽然缅甸政府一直为针对罗兴亚人的政策百般辩解，但国际社会坚持认为其保护罗兴亚人的工作做得太少。不过，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不仅能够影响缅甸国内局势的稳定，而且也影响缅甸与各伊斯兰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关系，甚至会为此遭到报复性制裁，也迫使缅甸政



府不得不为此花费心思。



（资料图：“969 运动”的领导者阿欣威拉杜，被外界认为是激进的缅甸极端民族主义佛教徒。）

由于缅甸是传统上的佛教国家，佛教僧团十分在意教众的顺从，其地位甚至是全世界各种宗教的神职人员中最高。在 2011 年缅甸政治变革后，陆续出现了一些激进的极端民族主义佛教组织，比较有代表性的有“Mabatha”和“969 运动”，他们经常率众开展规模庞大的反穆斯林行动，并组织针对穆斯林企业的经济抵制。佛教僧团甚至禁止女佛教徒嫁给非佛教徒，“除非对方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皈依佛教”，并力促缅甸联邦议会尽快制定《改变信教法》，当然这些佛教激进主义也遭到缅甸国内一些知识分子的批评。

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同样无法避免被穆斯林群体和罗兴亚人问题所波及，一方面她很少公开同情罗兴亚人的遭遇受到国际社会的指责，另一方面佛教僧团同样对她不谴责穆斯林群体严重不满，这些复杂而矛盾的情况屡屡令其左右为难。“969 运动”的领导者阿欣威拉杜还带头反对修改缅甸现行《宪法》，反对让拥有外国配偶或子女的缅甸人竞选总统，由此将使昂山素季参加 2015 年的总统大选道路受阻。

2014 年 5 月，《纽约时报》甚至公开指责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称她没有在罗兴亚人的问题上明确表过态，认为她“一直可耻地保持沉默，只愿意泛泛地谴责暴力活动”。

耶博雍籍牙说："除了民主进程问题，缅甸今后还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问题，而罗兴亚人的复杂情况，将使宗教冲突问题更加尖锐。"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回归之惑】

丁学良：中国治理香港的“劣势”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香港过去的发展、繁荣和稳定，主要不是殖民主义制度有多么完美，而是白白得了‘比较优势’的好处——毛时代中国内地的状况实在是太糟糕了，反衬之下，香港尚可安身安家、打工赚钱，华人老百姓因此不愿意起来推翻不太糟糕的港英政权。

”

刚掀起了“七一”大游行的香港民间社会，这几天又在筹划“占领中环”的具体步骤和日期（提议最早在今年八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政治改革的决议之后）。亲政府的报刊连连大声抱怨：如今的香港已经成了“游行之都”——这些年来差不多每星期都有游行示威，过若干年就有一次达到几万人乃至几十万人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香港确实变得越来越难以管治：这次“七一”大游行的主题是“自己政府自己拣（选）”，游行人士沿途高叫现任特首下台、争取公民提名普选下届特首。面对着像开水锅翻滚的香港政局和民情，中国大陆官方人士和为数不少的老百姓频频发出尖锐指责：“你们如今天天向中央政府要真普选，当年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你们为什么不要求搞民主？”言下之意，是香港人“贱”，“甘当英国殖民主义的奴才”。

表面上看，以上的指责挺符合史实——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后半个世纪里，当全球的殖民地相继去殖民化、闹独立、搞民主的期间，香港却大体上安安稳稳，没有风起云涌的反殖民主义大规模运动。

为什么香港人看起来“很服英国管，不服中国管”？难道香港人真的特别“贱”、“偏好为奴”？这个大问题必须解答清楚，否则北京的中央政府乃至中国大陆亿万民众跟香港人都难以化解分歧、理顺关系。

殖民地时代的香港与反殖民浪潮相悖

我离开中国出去留学的 30 年之前，正是中英关于香港回归谈判的要害时刻。那时候的我刚刚有机会面对外部的真实世界，诸多重大疑问油然而生，其中最令我难以解释的难题之一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正是非殖民主义化的最高潮时期——香港偏偏不跟随全球的民族解放浪潮、走上反殖民主义的大道？为何香港与世界潮流那么南辕北辙？

过去这些年里，对好几个前殖民地的亲身观察和体验，牵引我找到符合实情的解答。这个至今让中国官方和无数大陆人民恼火的问题，只能放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背景下去疏理，才可以悟出真相。

我们这一代人出去留学时，带了不少的中共传统革命思维。其中一个观念就是：全球 20 世纪的发展大趋势、尤其是在二战后，是非殖民化的过程。按照当时中国人熟悉的毛泽东式语言，就是“人民要自由、民族要独立、国家要解放”。

很巧合的是，就在今年 6 月 22 日香港市民自发举行公投前的一天，中国驻港前任高级官员、现任港澳研究会会长的陈佐洱在批评如今的香港政治抗争一波接一波时强调：香港的非殖民化远未完成，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适应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可见这些中国官方人士与 30 年前的我是一脉相承的，被同样的那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所困扰——香港的非殖民化还没有完成。

讨论目前香港连续不断的政治风波，此乃不能回避的历史根源。

以下我试图讲清楚的就是：为何当年英国统治香港的时候，香港的华人虽然没有同等的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持续的反抗？这样的情况即便放在同时期的世界历史上来看，也是很特殊的，因为殖民主义统治的本质（by definition）就是外来的少数人统治当地的多数人。殖民主义政权一定拒绝普选——只要一搞普选，本地多数人的选票就会结束外来少数人的专权。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中，这样的统治方式都遭到了大的反抗，既有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挑战，也有街头的民众抗争，乃至武装起来的民族解放运动。

那么，为何香港缺乏这些，如此特异？



二战后的香港是中国人几十年的避难所

如果观察二战结束到 1997 年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会发现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自决作为历史潮流席卷了全世界。二战前，殖民主义是一种普遍现象，亚洲多处都有殖民地，香港在那时先被英国、后被日本占领和统治，没有出现大的反抗也很正常。二战以后，香港与世界潮流逆向而行，是有深刻原因的，与一水之隔的中国大陆的巨大变迁乃是同一块钱币的正反面。

二战刚结束的香港，日本军队留下强占后的烂摊子，经济民生处于崩溃的边缘。日本人撤出后，英国作为宗主国又回到了香港。香港本应该和其他殖民地一样，籍此时机终结被外来民族殖民的历史，与中国大陆一起走进后殖民时代。然而当时的中国却在抗战结束后，直接进入全面严酷的内战，并未如国共两党宣称的那样，马上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和平、繁荣、独立的共和国。香港本应该出现的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社会运动之良机，被中国全面残酷的大内战一笔勾销。

于是，英国殖民统治延续下来。虽然 1940 年代末的香港经济民生破烂，好歹还有一个汇丰银行，银行的老板 Robert Morse 把所有能够筹集的资金，据悉是 700 万英镑，全部支出作为抵押，接收了（redeemed）日本占领军滥印发行的货币，挽救了濒临破产的金融体系，稳定了香港宏观经济局面，从而让香港成为一个能够和平建设的边陲之地——它的北边正战火纷飞。也就是说，相对内战之下的中国大陆，香港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避难所：从 1946 年到 1948 年，来自内地的资金和劳工促使香港的贸易额翻了一番。

内地阶级斗争的难民让香港经济起飞

等到中国的内战结束，1949 年大陆基本上实现统一，和平的社会秩序建立起来了，此时实为香港反殖民主义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可能的第二次契机。但立刻中国大陆就进入到剧烈的政治经济社会革命，这场大革命让一个落后的社会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阶层——企业家、金融家、商人、地主富农、知识分子成为斗争的对象。简单地说，中国大陆在刚刚结束了内战之际，马上出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战争——“阶级的战争”（列宁语），中国翻译成“阶级斗争”，这样的战争虽然不用大炮机关枪，但照样会让许许多多的人家破人亡。

而同时期的香港，却意外收获了大陆革命局势的两大“成果”：资本和劳动力。英国殖民主义政权战后的措施，只是稳定了香港的局面，尚不足以带来香港的高速发展。但大陆的

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却提供了香港经济起飞的基本动力——来自中国内地一波波阶级斗争的逃亡者。一方面来自东南沿海（特别是上海、浙江）的资本家，为香港带来了企业家和管理人才以及开办工商企业的资本。来自其他地区的难民（特别是广东），则带来了经济起飞的另一个要素——廉价劳工。

这就是香港为何在 1950 年代初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未曾涌现大规模反殖民主义运动的第二大原因——大陆一波波逃港的难民潮。

大陆难民刚到达香港，是四等公民——洋人是一等，本港出生的华人是二等，早先来港的华人是三等，经济权利、更不用说政治权利，是相对匮乏的。但相比于当时中国内地的状况，在各个可以比较的方面来说，香港还是好得多，因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宗教信仰、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受法律保障的：这些就是基本人权的内容。有了这些基本的人权，然后又可以打工糊口，运气好的还可以创小业发点财，逐渐地他们和子女还能享受到初步的公费医疗、公立教育的少许福利。你要他们敌视、仇恨、着手推翻香港的基本制度，很难办到。

有人要问：那为什么英国殖民主义政权会这样做？也许有人说香港需要利用他们的资本和劳力来发展当地的经济，或者殖民主义特别狡猾，以此收买人心。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是同样的。当逃到殖民地香港的中国内地人在这里得到了在他们的故乡无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以后，他们就会把在此之上进一步的生存、生活、经商、发展机会看得极端重要。

香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试图逃离内地的难民越来越多。仅仅在到 1950 年代初的几年里，就有至少 30 万人跑了过来。港英政府也因此设立了“东方柏林墙”，即从 1951 年起建立香港边境禁区，与内地完全分隔开。但内地阶级斗争越来越剧烈，土地改革之后，1957 年反右运动，后来就是三年大饥荒，再后来是“文革”。与此相应的，有好几次大中小型逃港潮，总共约达 56 万人次。

“文革”中逃港的最知名的就是海归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1966 年“文革”开始，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 年，他借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逃往香港。他本人则成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 10 年的逃港浪潮的开端。

1971 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中写道：“由于大外逃，深圳边境一线，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大逃港》164 页）。当时还有一个恐怖现象，流经广东广西的河流到了香港的入海口，武斗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从上游漂来的尸体，往往是五花大绑，带着被虐待的伤痕，都不是自然



死亡的。香港居民从报刊上看见照片，或者自己亲眼所见，让他们对北边的祖籍故乡惊恐不已，庆幸自己人在香港，没被卷进这些灾难。

在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之前，在北京方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个小型报告会上，我第一次提及这个问题，强调说：“香港过去的发展、繁荣和稳定，主要不是殖民主义制度有多么完美，而是白白得了‘比较优势’的好处——毛时代中国内地的状况实在是太糟糕了，反衬之下，香港尚可安身安家、打工赚钱，华人老百姓因此不愿意起来推翻不太糟糕的港英政权。”听众中有英国驻华使馆来的人，显出哭笑不得的神色。

香港殖民政权“维稳”的两个独特优势

我以上的历史厘清，并不是说香港在二战后一点反殖民主义的风浪都没有。虽然绝大多数的香港居民不愿意赶走英国殖民主义者，但也还有少数的激进分子不甘现状。香港至少发生过两次带有暴力成分的反殖民主义街头运动，第一次是 1956 年的“右派暴动”，规模小一些，是中国国民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促成的。港英政府抓了一些人，把国民党早先派来的骨干分子驱逐到台湾，从此以后国民党在香港发动群众的力量就完结了。

第二次要大得多，是 1967 年 5 月的“左派暴动”，主要是受了内地“文革”的刺激和支持，有人制造土炸弹，引发了街头的冲突和死伤。港英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抓了上千的人，把最骨干的力量驱逐到中国内地去，施行了一段时间的特殊街头保安和交通管制后，事情也大体平息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下令内地的文革势力不可推动香港的群众运动。

可见，二战后的几十年里，香港没有出现大规模持续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港英殖民政权还有两个法宝：第一，对涉及反殖民主义的言论不太理会，一旦付诸街头运动，就将涉及暴力行动的个人抓起来。第二，把最关键的骨干人物遣送回他们的祖国——你是“中华民国”派来在香港搞运动的，就驱赶你去台湾；你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指派在香港搞运动的，就驱赶你回中国内地，“人归其主”。这第二种方法特别有效，纯粹受理想主义鼓舞的群众很少，而一旦反殖民的骨干人物被驱赶回他们的大本营，香港本地的社会运动就瓦解了。

遗憾的是：英国当年有的中国如今没有

我以上对中国近现代史大背景下殖民地时期香港“特异性”的疏理，主要讲的道理都是基于人之常情，而非忽悠人的抽象意识形态。

英国治理香港的最后半个多世纪里，绝大多数香港居民之所以不愿意奋起反抗殖民主义，并不是因为殖民制度有多么完美，更不是因为香港人特别“下贱”，而是因为中国内地长时期多种形式的大动乱——全面内战、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等，使得香港比较起来是一个不那么可怕的避难所，普通华人在此能够谋生、发财、写作、图进一步的发展。

他们最担心的是：如果这块避难所丧失了，他们就会过与故乡同胞们同样可怕的那种生活。所以极少数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比他们人数多几十倍的香港华人（在那个时代，华人占本地人口的 96%-98%），就比较容易。作为华人，你要是极痛恨英国殖民主义制度，不安于现状，那你就回你的故乡去；你要是组织群众试图推翻殖民主义制度，港英当局就驱赶你回故乡。

这样的“比较优势”英国当年有，如今的中国却没有——今天香港居民中的绝大多数，你无法让他们继续有一种“被殖民地保护”的心态。他们的普遍心态是：“殖民主义者已经走了，我们要把自己的家园发展得越来越好。”对于那些非常不满目前的香港政治制度、企图发动群众改变它的骨干分子，你也不可能把他们驱赶回故乡，相反，中国内地政府这几年来能够做到的，是坚决不许他们回内地去，怕的是他们在内地闹事。

前不久我在大陆与朋友、熟人谈起英国治理香港比中国治理香港更容易时，非常耐心地解释过这后面深层次的“比较优势”的道理。随后有听众问：那还有没有可能，为中国治理香港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我说，除非你能够告诉香港居民，如果你们不满意北京的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那就马上让北朝鲜来治理香港。只要有这样的“比较优势”，香港立刻就会很服北京的中央政府管治。

你听起来这是笑话，其实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道理。

（文章原载于 FT 中文网）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马岳：民主化与香港的后殖民政治之路



马跃，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

“

在宪制原则上，中国是单一制国家，香港特区只是地方政府，所有权力由中央按照《基本法》授予，不像联邦国家中的成员州郡有其独立的主权性质。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规定下赋予香港的高度自治，一直是中央为了令香港资本主义有效运作而下放的权力，是在国家利益前提下，给特区的政治制度配件。因此在中央领导人眼中，香港的高度自治没有本质性和主体性，而是从属于国家的经济或其他利益。换言之，如果国家的经济或其他利益有需要，中央政府是可以限制或收回香港的（至少部分）自治的。

”

一　一国两制的本质与矛盾

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领导人为了让香港可以在主权回归后保持稳定和繁荣，提出以「一国两制」保障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相反逻辑的经济体制，在国家发展和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取得了矛盾的统一。

「一国两制」可以被视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这一中央对港政策的延续[1]，基本构思是在主权统一的情况下，透过政治制度安排，赋予香港特殊的地位，在回归后继续以资本主义都会的角色来贡献国家经济发展。正如佳日思（Yash Ghai）教授所言，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本质是「两制分隔」（separation of systems）[2]，《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内的许多规定，都是为了在一国主权下分隔「两制」，防止内地各项社会主义制度的运作逻辑，在回归后干扰香港的资本主义运作。

在这个前提下，香港在「一国两制」这一政治方程式下，拥有多项内地省市、经济特区或自治区没有的自治权利，出发点是保障九七后香港的资本主义体系可以有效运作。《基本



法》规定特区拥有行政权和立法权，是为了让特区可以按资本主义的逻辑自行操作资本主义。原有司法制度和各项公民权利不变，是为了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和产权制度可以在回归后有效运作，使香港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得以维持。香港在财政和税制上独立，港人和港府甚至不用向中央缴税，是为了确保香港政府会以资本主义政府的财政原则操作公共财政。佳日思甚至指出，《基本法》在经济体制部分规定了特区的经济方针和原则，剥夺了特区部分的自治权利，也是为了确保在中央心目中的「港式资本主义」不会在回归后变质[3]。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中央在草拟《基本法》时答应开放部分政制民主化，也是为了在过渡期安抚香港人和维系港人信心，是「一国两制」的一项政治配件。

在宪制原则上，中国是单一制国家，香港特区只是地方政府，所有权力由中央按照《基本法》授予，不像联邦国家中的成员州郡有其独立的主权性质。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规定下赋予香港的高度自治，一直是中央为了令香港资本主义有效运作而下放的权力，是在国家利益前提下，给特区的政治制度配件。因此在中央领导人眼中，香港的高度自治没有本质性和主体性，而是从属于国家的经济或其他利益。换言之，如果国家的经济或其他利益有需要，中央政府是可以限制或收回香港的（至少部分）自治的。

回归十年，「一国两制」在实践上的主要挑战，并不在于内地的社会主义逻辑侵蚀香港的资本主义运作。随著中国持续向国际市场开放，国内经济迅速市场化，加上中港经济融合的大趋势，两地经济体制的距离愈来愈小，故并不是「一国两制」的主要矛盾。特区十年，中央政府很少介入香港的经济和社会事务决策，只有少数事件引发市民、传媒和政界质疑高度自治的实践。这些事件包括中央在香港民主化上的主导角色、人大释法中反映的中港法制差异问题、香港的公民自由触及内地政治底线的问题（例如有关法轮功、台湾问题、中国异见人士的处理等），以及「资本主义生活模式」与国家利益冲突的问题（即如《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等。简言之，回归后「一国两制」的矛盾，主要来自各项香港资本主义的政治配件（包括公民自由和局部民主化），和中央处理香港的基本政治方程式之间的矛盾。

二　回归十年的一国两制

回归十年，香港人对中央政府处理香港事务的信心日增，不再担心中央事事干预。

回归后的政治实践令香港人大致明白了「一国两制」的底线，例如一般社会和经济事务决策，中央绝少干预，但在政制发展问题上，中央会毫不犹豫地行使其最终决定权。回归后人大常委三次就《基本法》进行释法，其中第二和第三次都是关于香港政制问题，显见中



央在政制问题上，不惜付出国际和香港人批评「干预高度自治」的代价，也要行使控制权，并且要对香港人明言，中央就香港的政制事务有最终决定权。回归后其他引起「违反高度自治」批评的事件，不少都与言论自由、法治和公民权利有关。香港人惯享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公民权利，往往在触及中央的政治底线时，便会受到限制。

1999 年的人大释法，可说是回归后对「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最大考验。1999 年，特区政府由于不满终审法院就居港权的判决，认为判决会令大量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涌至香港，造成政府的沉重负担，于是提请人大常委解释《基本法》第二十四条，以推翻终审法院的决定。对香港的法律界而言，此举不啻是破坏了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中有关终审权属于香港法院的规定。法律界同时质疑：《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提请人大常委释法的主动权在特区法院，并没有提及特区政府可以绕过法院提请人大释法。如果此例一开，未来特区政府凡不满特区法院的判决，便寻求人大释法，《基本法》内的高度自治和司法独立原则都难以保障[4]。

此外，回归后种种对干预「高度自治」的批评，往往源自香港的公民权利和内地政治立场的冲突，例如特区对法轮功的处理。自 1999 年法轮功在内地被定性为邪教后，香港的亲北京圈子便有声音要求在香港订立邪教法以取缔法轮功，特首董建华也曾公开表示法轮功「毫无疑问是邪教」[5]，惹来宗教人士及人权分子的批评。2002 年，十六名法轮功学员在中联办外练功时被拘捕，被控「阻街」，罪名成立被判罚款。同年法轮功香港分部投诉多次申请场地举办活动，均被康乐文化事务署拒绝，可以算是对他们公民自由和结社自由的限制[6]。但最终特区政府未有取缔法轮功，法轮功至今仍大致可在香港自由活动。

因「一国两制」而限制香港言论自由的事件，不少与台湾问题有关。1999 年，台湾中华旅行社总经理郑安国在香港电台节目中解释李登辉的「两国论」立场，招来对香港电台的批评。2000 年 4 月，即陈水扁首次当选总统后一月，香港有线电视播出对副总统吕秀莲的专访，引来中联办副主任王凤超批评，指香港传媒不应把台独的消息「当成一般新闻般处理」。5 月 31 日，中联办台湾事务部副主任何志明更公开表示，香港商人不应与支持台独的台商做生意[7]。这是回归后中央驻港官员直接批评和干预香港自由的罕有例子，显见在中央的理解下，「一国两制」下的特区自由，并不包括容许台独言论散播的自由……

（全文浏览请点击【原文链接】）

注释



1 Kuan Hsin-chi, "Is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rmula Working?", in Hong Kong in China: The Challenges of Transition, ed. Wang Gungwu and John Wong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9), 23-46.

2 Yash Ghai, Hong Kong's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 The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the Basic Law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138.

3 Yash Ghai, Hong Kong's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 例如《基本法》规定特区政府收支平衡、奉行低税率、不实施外汇管制、确保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等，都是属于经济政策范围，但由于已经写进宪法，变成是对特区政府决策自主性的某种限制。

4 有关的宪法争论，见佳日思、陈文敏、傅华伶主编：《居港权引发的宪法争论》（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0）；黄江天：《香港基本法的法律解释研究》（香港：三联书店，2004）。

5 《成报》，2001 年 6 月 15 日，页 A4。

6 见《信报》，2002 年 6 月 26 日，页 2。

7 Frank Ching, "The Handling of Sensitive Political and Legal Issues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during the First Three Years of the HKSAR",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HKSAR, ed. Joseph Y. S. Cheng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Press, 2001), 119-38.

（文章原载于《二十一世纪评论》）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张洁平：曾钰成：我们走进了一个恶性循环



张洁平，自由撰稿人，现居香港。

“

如果方案被否决，不仅香港的管治将陷入更深的危机，中港之间的互信跌入谷底，更会刺激中央进一步收紧治港政策，而这也会给一国两制带来“最严峻、最重大的考验”。

”

如果曾钰成出来竞选，他可能是香港最有希望当选民选特首的人。

作为传统左派，建制派第一大党民建联的创党主席，他的“爱国爱港”背景令中央放心。“六七暴动”时，他的弟弟曾德成曾因张贴标语被捕入狱，而曾钰成当时从香港大学数学系毕业，放弃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加入整个社会已经闻之色变的左派学校（培侨中学）做老师，这段传奇经历在香港至今为人津津乐道。时隔多年，他也曾在接受采访时公开反思，认为六七暴动给香港造成深远伤害，而他们当时所追求的社会主义，也因为中国后来的改变失去意义。作为建制派中开明人物的代表，他 2008 年开始连任两届立法会主席，被公认为做事公允，讲话诚实，一直致力于弥合泛民主派与建制派之间的分裂，颇得民心。在唐英年与梁振英鏖战的 2012 年，连著名亲泛民媒体《苹果日报》都写社论力撑曾钰成，标题就是：《曾钰成是下届特首的最适合人选》。

不过他最终没有在 2012 年参选。他自己说是因为“准备时间仓促”。2017 再战？他说自己到时已经年满 70 岁，老了，宁可把精力放在推动普选的实现上。全香港人都看得到他为此殚精竭虑。还有网民笑言：为了力推普选，“曾钰成可以去到几尽？”（意思是可以拼命到什么程度）

2007 年，人大给香港政改列出时间表，当时香港社会一片半信半疑。曾钰成却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坚信中央说到做到，2017 年香港一定有普选。2012 年，北京没有清晰回应 2017 年普选“门槛”的问题，但曾钰成对“真普选”信心满满。2012 年他接受《明报》访问时说，这不是信念问题，而是逻辑问题，“没有普选，无法管治，就这么简单”。他说自己多次向中央官员提及，“如果你想通过一个筛选机制的行政长官选举方法，是行不通

的”，因为后果是“灾难性”的。2013 年，普选议题开锣，曾钰成直言：中央需“放下心魔”，不要筛选高民望的泛民人士参选特首。结果被亲建制阵营攻击，说在激进派主导形势的情况下还叫中央坦然以对，是出卖“爱国爱港”阵营，网友则笑谈，普选压力竟然把曾钰成“逼成了民主派”。

2014 年 8 月 31 日，人大常委会宣布对香港政改的决定。这一决定给香港 2017 年普选定下方案，其中含有明显的针对不同政见人士的筛选。人大还强硬声明，这是最终决定，如果香港立法会不通过，则此后香港若要再次重提普选，也都要遵照这一决定。曾钰成此前苦口婆心的谏言，没有实现。

决定一出，香港舆论大哗，泛民主派议员宣布要集体杯葛方案，酝酿了一年多的“占领中环”公民抗命也宣布将展开行动，香港中文大学的民调数字称，有超过 50%的市民不接受人大方案，认为立法会应该予以否决。

在这个时候，曾钰成却接受现实，并力劝社会及泛民政党接受这个方案。接受我的采访时他说，如果方案被否决，不仅香港的管治将陷入更深的危机，中港之间的互信跌入谷底，更会刺激中央进一步收紧治港政策，而这也会给一国两制带来“最严峻、最重大的考验”。明年立法会将表决这一方案，作为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原则上不应参与投票，但他 9 月公开声明，不惜采用投票然后辞职的方式，希望可以力保方案通过。

在北京有明确决议之前，他力劝北京克制；在决议之后，他则力劝港人接受。曾钰成的务实风格可见一斑：不谈政治理念，而讲现实逻辑。

9 月 28 日，至少十几万人坐满了香港核心政治及金融区的马路，进而是商业区旺角和铜锣湾。从计划中的“占领中环”演变至“占领香港”，争民主的公民抗命发展到这一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此前一直与“占领中环”发起人陈健民维持着私人交往的曾钰成。大规模的“占领运动”陷入僵持阶段时，曾钰成也是少数几个在对峙双方中间斡旋的重要人物。10 月 1 日，他与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私下会面，但事后向传媒表示，双方底线差距太大，会谈没有结果。

10 月 3 日，占领运动的第 6 天，我在沙田一家酒店的咖啡厅专访了曾钰成。他个头瘦小，走路速度很快，谈话时条理清晰，记忆力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记住三四个复杂的问题连续回答。但因为时势关系，他的情绪也显得相当沉重。他并不愿意长时间正面谈论“占领”，但讲到香港所陷入的困境，频频叹气。他从中央治港政策的角度理解目前的普选僵局：2007 年是特首民望最高，回归以来香港最强政励治的时候，令中央放心，觉得即使普



选，建制派也可以当选特首，所以才给香港开出 2017 普选的时间表；而 2008 年后民情逆转，到 2012 年爆发了中学生带头反对国民教育的运动，并且竟然成功迫使梁振英政府撤回了国民教育科，曾钰成说："听说这一点，北京当时是很不高兴"，由此激化了北京对香港政改的控制。

曾钰成说，自己最担心的是，北京越来越紧的控制与香港越来越激的抗争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终可能给一国两制带来根本伤害。现实中，这种循环似乎正在发生，但结果，无人知晓。

10 月 8 日，曾钰成宣布取消了原本要在这天举行的立法会大会，而泛民主派议员原本计划在会上讨论警方是否使用过度武力镇压示威，以及提出弹劾特首梁振英的提议。占领运动仍在持续。曾钰成在记者会上，对取消会议的解释是，由于出入口被占领，警方无法进入立法会大楼，会场内外的秩序无法保障。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曾钰成专访摘要，未交曾钰成本人审定。

问：几万人坐在马路上，已经超过一个星期，占领运动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您之前有预想到吗？

答：完全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最近大家见了面都说，从来没有估计到。我看"占中"的最初设想也不是这样。至于原因，我想我还是不要评论。事实就是，参加占领运动出来的市民，是比任何人之前的估计都要多。其中年轻人占了多数。

问：群众运动发展到后期，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退场。您怎么评估这种可能性？

答：无论是最早发动"占中"的"占中三子"，或者说学联的领头人物，他们应该也从来没有想到运动会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正是这个原因，他们也知道，他们不可能有效地规范和控制它的发展。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时间拖长了，出事的机会就高。我也知道，他们需要寻找安全退场的途径。但是，起码到现在，这是不容易。因为大家的口号已经叫响了——人大重启政改、梁振英下台。这两条诉求，老实说，我认为现在参加示威的大部分人也知道，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提也提了出来，怎么办？学联要求与政府对话，但占领运动实际上没有一个很权威的、大家都愿意追随的领导，学联不能代表全部人，就算谈成了什么条件，参与示威的人也不一定会散去。

问：那您怎么看待这场运动的发展？



答：我的看法，是还要过一段时间。过多久，要看社会民情的变化。现在拖下去，我认为，对占领运动的人是不利的。因为时间拖长了，受到滋扰的人是越来越多。再加上他们不能保证运动的发展有一个最合理、最好的策略，同情你的人可能越来越少，反感的人越来越多，这对运动者来说就有压力。为什么要寻找退场机制，就是因为组织者看到这一点。运动的诉求还没有达到，多次发出最后通牒，说你不下台，我就升级。你怎么升级？你越升级，对运动本身的压力就越大。比如你冲击政府机构，政府很难不调动最大警力来防御，冲突就会很尖锐。另外，你越升级，会造成更多普通市民的不满。你不升级，这样拖下去，能维持多久？发展到这个阶段，对任何群众运动的组织者，是很大的考验。对政府的考验当然也很大。很明显，9 月 29 日开始，政府也改变了 28 日的做法。28 日施放催泪弹的做法，大家客观上看到，完全不能起到让示威者散去的作用，反而刺激更多的市民出来参与。29 日开始，特区政府改变了对付占领行动的策略，我认为还是对的。目前，我只能希望再过一段时间，大家都可以用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提出一些比较可行的条件。

问：看学联与学民思潮提出的四大诉求，包括要求人大撤回决定、特首梁振英下台、普选需要有公民提名、重开公民广场，似乎重开公民广场——就是那个政总门前在 7 月被加上铁栏杆封闭起来的示威空间，是最有可能实现的？

答：相对其它三点，当然可以说比较容易。但也很难要求特区政府说，好吧，我们就开放。从政府的角度看，我开放了，能换来什么？是不是马路上的人就能撤离呢？也不一定。我开放了公民广场，你就会放弃升级行动吗？如果我开放，更方便你冲击政府总部，那我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呢？就算政府是愿意开放——这一点，我现在还不能太有信心——从示威者方面，你也要考虑，开放能换来什么。

问：在这次运动里，明显可以看到 1989 年天安门事件的影响，开枪流血的阴影笼罩着所有人，施放催泪弹那天，很多人会高喊口号：“香港不是天安门！”

答：我只能是这样说，我认为历史是不会简单重复的。前事不忘，大家都记得以前的经验。包括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都明白，要尽量避免出现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学生方面也是这样，他们懂得怎样从前人的经验吸取教训。大家都不愿意看到，悲剧再次发生。

问：这次运动的起因是民主诉求，很多市民认为 8 月 31 日人大关于香港政改的决议，断送了香港 30 年来争取“真普选”的希望。有泛民主派的议员集体声明，说将尽力在立法会集体否决这个方案。但您一直力倡让人大方案通过，并多次强调如果不通过，香港会面临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到底是什么？



答：我认为危机有几个方面。第一，特区政府管治面临非常大的困难，不说是无法管治，但是非常困难。这个困难不是个别人的能力问题，而是我们的体制上有内在的矛盾、问题，令到有效管治很困难。所以我们必须针对体制上的问题，去研究怎么解决。但是，我们政制发展的最后一步——普选行政长官、普选立法机关，已经成为社会和议会里最主要的课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它问题没有人有兴趣，没有人愿意跟你谈。如果不先解决这个问题——起码，暂时，先把它挂起来，有个阶段性的解决，才能凝聚社会的力量，去研究解决我们管治上的很多问题。

第二，2017 年能不能普选行政长官，不光是 2017 年的事，是我们讲了很多年，香港人等待了很多年的事。你今天问我，一人一票普选的政治制度是不是真的最好，最适合香港，我不敢说，但我们没有其它选择了，因为基本法已经写了，2007 年人大也做了决定了，大家都非常强烈地觉得 2017 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了。要是我们不成功，那香港很多市民一定感到非常失望。老实说，如果 2017 年没有普选，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甚至可能以后都不可能有。刚刚说的，因为管治问题产生的矛盾，就会更加尖锐。过去这几年，对特区管治不满意的人，会说，我们等，等到这个普选再说。现在没了，连这个希望都没了。整个社会的气氛肯定很坏，会更增加管治的困难。

第三，最终，行政长官普选产生，立法会全部议员普选产生（注：按照人大定出 2017 年普选行政长官的时间表，立法会普选最快在 2020 年可以实现），是写在基本法里的，是我们落实一国两制的关键。我们如果不能达到基本法说的最终目标，也就不能说一国两制成功了。要是我们 2017 年没有行政长官普选，2020 年也不可能普选立法机关。如果香港人就像最近的占领运动一样，用比较激烈的方式表示不满，那中央也会考虑，香港的局面，还可以维持繁荣稳定吗？当然习主席最近重新强调，会坚定不移地实行一国两制，但是，如果真的发生威胁到香港繁荣稳定的事件，我认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也需要考虑了，这个一国两制到底怎么落实。这直接影响到香港的命运，也直接影响到国际社会对香港成功推行一国两制的信心。

问：所以您认为这是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遇到的最大挑战，而且万一出事，中央政府可以讲，是你们先不要一国两制的？

答：是，肯定是这样。

问：但是为什么很多非常资深的政治学者都认为，人大给出的这个“普选”不能要，宁可拉倒，也不能“袋住先”，否则再没有改善的机会？



答：老实说，任何人你真的去研究下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我认为不可能得到这么一个结论：你接受了人大决议，就是大倒退，就是等于放弃了争取普选。但是很可惜，在 8•31 以后，整个社会气氛、政治氛围，让很多人，包括我们学者，都不能接受这个方案，真是很可惜。我认为是，第一，你认真地去拿人大决定来跟现在比较，肯定人大决议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绝对不是退步。更重要的，走了这一步，就等于保持我们的门继续打开。要是泛民主派不满意这一套，走了这一步，就可以为再往前走创造条件。反过来，要是你否决了，我认为等于把门关上了。你否决了，你觉得中央政府会转过头，拿一个你更满意的方案出来？不可能。

问：您以前说过，需要分辨哪些事情是可以改变，哪些事情是不可以改变。您觉得这件事就是香港政治现实的天花板吗？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答：对，就是这样。很多人认为，只要我们调动足够多的民意来抗争，就可以把这个天花板拆掉，或者把它抬高一点。但是天花板的高度，很大程度，是要看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放心程度。你让他越放心，他就越放开一点。你让他越不放心，他就越感到所谓国家主权、安全受到威胁，就收得越紧。只能是这样。如果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起草基本法的时候，维持香港繁荣稳定是中央政府的第一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的话，那今天，这个情况已经变化了。香港发生的事，今天中央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它对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到底有什么影响。如果中央政府最后要做衡量，一边是香港的繁荣稳定，一边是国家安全，就这几年的情况来看，肯定是把国家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就是这样。要是通过这次运动，让更多人认识到你说的“天花板”，可能坏事会变成好事，否则……

问：中央对港政策转到国家安全的思路上，这个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答：主要是 2012 年。2012 年 11 月召开十八大的时候，中央政府第一次提出，中央政府对香港政策的基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以前不是这么提。这不能不让我们看到，就是因为 2012 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一连串变化，促成中央重新思考，对香港政策的方向。

问：中央对香港政策在回归以来，究竟经过了哪些变化？

答：回归以来经过了几个阶段。1997 年到 2003 年是非常放手，当时我是民建联的主席（注：民建联是香港亲建制派第一大党），中央政府告诉我，你们不要来北京，有什么事，你向董先生提，向特区政府提。当时北京对香港完全放手，政策只有三个字：不干预。

2003 年，发生了 23 条立法不成功，50 万人上街，反对特区政府。中央政府一看，我们过去这几年完全放手不对，于是 03 年年底成立了港澳工作协调小组，非常高层次，曾庆红是召集人。他马上邀请民建联去北京，当着香港的传媒，在“不干预”之后加了三个字：“有所为”。一直到 05 年，换了行政长官。

从 05 年到 07 年，整个社会气氛是比较活跃的，第一是 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发挥作用了，香港经济好转，都知道是中央的支持；第二是曾荫权上台，解决了一些董先生不能解决的问题，他跟泛民关系也比较好。一段时间之内，好像强政励治成功了，有效管治成功了，巅峰就是 2007 年曾荫权竞选连任，民意支持度也远远超过了当时和他竞争的泛民主派的梁家杰。当时有种说法是，就算是普选，曾荫权也会当选。这么一个气氛下，2007 年底，人大常委会决定了 2017 年香港可以实行普选。这个时间表是这样出来的。当时定这个时间表，很多人，包括泛民主派的很多人，都很意外。大家本来不相信中央愿意拿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就是因为 05 到 07 年，整个社会气氛比较稳定，管治比较顺利。08 年开始，局势逆转了。市政上，本来应该做的事，的确是没有做。正如当时温总理提醒，需要解决“深层次矛盾”。加上问责制发展不太顺利，出现了民望逆转。一直到 2012 年，年初的行政长官选举，出现了很多中央意想不到的状况，然后梁振英先生一上台，就遇到很大很大的阻力。当年夏季，就是反国教运动。

反国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件。从中英联合声明开始一直到回归之初，中央政府讲的，做的，都是要尽量去增加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但是好像过了这十多年，能给的好处都给了，还是不行。不但不行，回归了 15 年，还会出现 2012 年的情况，发展到学生带头出来反对国民教育。而且，结果真的是特区政府要把国民教育撤了。听说这一点，北京当时是很不高兴。

真是很可惜，我们已经走到普选的最后一步时，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形势逆转的情况。我担心的是……唉……我们走进了一个恶性循环。一国两制里面是有很多两制之间的矛盾，需要双方以最大的善意、互信，用务实的态度来解决。这方面现在很缺乏。中央不放心，觉得要收紧，然后中央收紧，香港人更大的不信任要抗争，一边抗争越来越激烈，另外一边收得越来越紧。当然我们也明白，同一个时间，我们迎来了一国两制启动以来，最严峻、最重大的考验，就是普选的问题，到了一个摊牌的时候。

问：所以才有了今年 6 月的白皮书，对“一国两制”做了一个与以前很不一样的阐述？



答：6 月发表的白皮书，强调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列出了很多条。当年，基本法立法的时候，不是这样说的，当时的中央官员跟我们说：不能说除了国防、外交都是香港人自己管，你看看基本法，里面还有其它权是中央政府一定要管的，但是，是很少数。我记得有一个中央官员跟我说明，只列出七条，包括国防、外交、任命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涉台事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等等。当时的官员说，就是这七条，没其它了，其它都是你们自己管了。现在的白皮书说什么？给你多少，就是多少。所谓高度自治的意思，我说你多高，就是多高。当然这也是事实。但你看得到这个表述的变化。所以是回归 17 年，香港发生的变化，让中央觉得，以前我强调一国两制宽松的一面，现在要强调限制的一面。

问：当强者与弱者对峙的时候，你一方面要劝弱者非暴力，另一方面更要劝强者克制。香港社会与北京之间某种程度也是这样的关系。

答：现在既然发生了这件事，如果可以理性处理，有可能促使大家反思，知道“天花板”在哪里，也有可能开辟一条更有效的、实现一国两制的路。要不然的话，北京也好，香港也好，可能我们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刘岩川

设计：潘雯怡，季文仪

校订：李佳凝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